

文革中毛、林之爭的初次交手

——武漢「七·二〇事件」真相

◎ 申曉雲

今年是文革四十大祭。四十年前，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革命風暴驟起，不僅席捲了整個中國大地，而且肆虐整整十年，其給國家、民族，乃至很多家庭、個人帶來的災難和傷害，都是刻骨銘心的。然而，四十年過去了，這場風暴究竟緣何而起？在風暴的中心發生過些甚麼？何以造成如此浩劫？究竟誰該對所有這一切負責？……這些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卻仍然是個謎。《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似乎已對以上問題作過結論，然而，經歷過文革的中國老百姓對這類官樣文章早已失去信任，他們有權力要求知道歷史的真相，知道給他們帶來如此深重傷害的根源究竟是甚麼，而不是僅僅滿足於「揭批『四人幫』」。本文是對文革中震驚全國的武漢「七·二〇事件」來龍去脈歷史真相的一個考察。文章主要依據為「七·二〇事件」前後以中央名義下發的主要檔，毛、林、周等中央領導人和文革小組成員的一系列講話，和現今已正式出版的當事人回憶錄等。由於仍受某些核心資料缺乏的限制，其中有些分析是本人依據史料的邏輯推理，僅為一家之言，是否能成立，有待以後史料的進一步印證。

一、文革中的毛、林關係和矛盾的產生

林彪事件是文革中最為震撼，也是最撲朔迷離的事件。作為毛的「親密戰友」，中共黨的第二號領袖，且已被黨章明確規定為毛的「接班人」竟在一夜之間成為叛黨、叛國的「陰謀家」、「野心家」，並在出逃的過程中可恥地摔死于蒙古的溫都爾汗大荒漠，這一當時讓舉世愕然的事件，究竟是怎麼發生的？為甚麼會發生？文革中毛、林的交惡究竟起於何時？他們的真正分歧又是甚麼？對此，從中共對林彪事件所作的結論和披露的檔案，以及現今的研究成果來看，似乎毛、林矛盾乃肇起於中共九大召開之時，而是會政治報告的起草之爭則為「林同毛在政治上分歧的開始」。¹其實，此說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文革中毛、林矛盾的產生，要比這早得多。根據現有史料，已可明確判斷：文革中的毛、林矛盾開始於1967年初，也就是以上海「一月風暴」為標誌的全國性奪權鬥爭掀起高潮後，而發生於是年7月的「七·二〇事件」實乃毛、林交惡的肇端。

在敘述這一段史實前，有必要對文革前後的毛、林關係作一點簡單追溯。林生於1907年，比毛小14歲。毛、林相識40年，共事也有30多年。在這30多年中，林彪作為中共將領中最出色的「常勝將軍」，為毛打造紅色江山立下了汗馬功勞。而作為毛的親信大將，在追隨毛多年後，也看清了毛要做的，以及所喜歡的一切，於是投毛所好，不僅在黨內劉少奇集團處於鼎盛時，林堅定地站在毛的一邊，為毛摒擋來自對手的攻擊，²還在其任國防部長期間，大力提

倡學習毛澤東著作，編選《毛澤東語錄》，背誦「最高指示」，並用他那明快的林式語言，發明了「四個第一」、「突出政治」等，把對毛思想的學習推向了全軍，乃至全國。文革中，更是把毛吹成幾千年才出一個的「超天才」、「救世主」。³為保障毛文革步驟的采行，迫毛的對手低頭就範，林動用軍隊對北京及其周邊地區實施了有效控制，這是毛輕鬆拿下「三家村」，搞垮北京市委，並從武漢回到北京，開成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十六條》，正式掀起文革巨浪的關鍵。所以，可以毫不誇張的說，沒有林的支持，毛的文革是發動不起來的。於是，林彪被公認為毛最最親密的「戰友」，文革造反大軍當之無愧的「副統帥」。

然而，毛與林的關係也並非如人們所知的那樣「親密」無間，否則在毛需要讓林彪為其發動文革「保駕」時，也用不著以犧牲羅瑞卿來達成與林彪的交易。⁴此外，林彪事件後才公開的毛給江青的一封信中，也可看出毛對他「那位朋友」的不屑。⁵而這一不屑並不僅是因為「那位朋友」對他的肉麻吹捧，毛其實對此是很受用的，而且也有需要，之所以有反感，主要是毛看出了他「那位朋友」對他的吹捧並不那麼實心實意，而是如他信中所說，是「為了打鬼，借助鍾馗」。而毛向來只有他利用別人，卻容不得別人對他的利用，這才是他之所以對他「那位朋友」產生反感的主因，其實，這也是明瞭嗣後毛、林關係迅速走向惡化的關鍵。當然，儘管毛、林之間確非一無嫌隙可言，但總的來說，數十年風雨中，毛、林之間還是保持了較他人更為緊密、牢固的關係，尤其是文革開始後，兩人的關係更得到了發展，只要有偉大統帥的光輝形象出現，他的身旁就有一個晃動著「紅寶書」的副統帥，給人一種形影難分的印象。然而，統帥和副統帥的親密合作只進行了一年，1967年，隨著軍隊「支左」的開始，兩人的矛盾產生了。

文革中的軍隊「支左」，可以說最初是秉承毛的指示進行的。在1966年快要結束時，由於毛、林聯手，挫敗劉、鄧已取得決定性勝利，以往被毛認為已被劉少奇篡奪的黨中央大權又回到毛的手中，下一步文革如何進行，可供選擇的方式有兩種：一、走以往搞組織清洗的路，對幹部隊伍作調整；二、整個推倒重來，按自己的理念重新設計政權機構。毛認為第一種方式不能徹底解決問題，劉、鄧經營多年，下面盤根錯節，剪不斷，理還亂，如果讓原來的當權派繼續掌權，那無疑將是劉、鄧「秋後算帳」的基礎。於是，毛決定採取第二種方式，乾脆把舊當權派全部打倒，另起爐灶，以便讓經受了文革考驗的毛所信得過的人取而代之，建立起毛所希望的革命新政權。為此，毛在他1966年12月26日的生日上，舉杯的祝詞竟是「慶賀全國全面內戰開始！」⁶毛用這樣的方式下達了全國「奪權」的動員令。⁷然而，要把原「當權派」全部排除出權力體制，當然也會受到原當權者自覺或不自覺的抵制。事實上，「一月革命風暴」掀起後，儘管各地大多數「當權派」都基本被迫「靠了邊」，但在原政權機構未被徹底摧毀時，這些老「當權派」，只要沒有被組織定性為「反黨分子」，不管造反派怎麼在大字報上「砸狗頭」，他（她）在所在地區和單位，仍具有相當威信，說話也仍具相當的效力。而在這樣的動亂時期，作為被革命物件的當權派出於一種自我保護的需要，一般也有兩種態度：一種是消極態度，即自動放棄權力，你要打倒，我就乾脆躺倒，這樣也能少犯錯誤，等運動後期組織下結論；另一種則較為積極，即對毛、林搞這一套不服氣，不買帳，或乾脆加以抵制，在「造反運動」起來後，公開對抗無疑飛蛾撲火，於是就如毛所說的，躲在背後「煽陰風，點鬼火」，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利用和操縱群眾組織保自己。於是在1967年初的時候，各地都較為普遍地出現了的兩派群眾組織對立的現象，一派被稱為「造反派」，對立的一派則被指為「保皇派」。但一般來講，由於造反組織成員比較複雜，且得不到支持，人數也較少，在地方上多半處在被壓制的地位，難以成大氣候。而其時奉了中央文革之命，到各地煽動「奪權」的北京造反組織，如「首都三司」、「北航紅旗」、

「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等，到各地後也都受到當地「保守組織」不同程度的圍攻和驅趕。為保障文革「奪權」步驟不被干擾。1月21日，毛在對南京軍區黨委關於是否派軍隊支持造反派的一份《請示報告》上批曰：「林彪同志：應派軍隊支持左派廣大革命群眾。以後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軍隊支持、援助，都應當這樣做。所謂不介入（文化大革命）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應重新發佈命令，以前命令作廢。請酌。」⁸第二天，毛澤東、周恩來等接見軍委碰頭會人員，要求軍隊「真正站在革命派方面，像唱戲一樣，要亮相」，「能夠公開支持（左派）的，就公開支持；時機不成熟的，就半公開支持。」⁹1月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佈了《關於中國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25日，《解放軍報》發表題為《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無產階級革命派》的社論。以「決定」和「社論」為起點，中國人民解放軍各部隊開始介入地方。為確保文革奪權鬥爭的順利進行，同時也為避免國家生產建設因動亂而受到衝擊和損失，並將「文化大革命」保持在可控的範圍內，在其後的數天中，毛又連續對軍隊在文革中應擔負的支農、支工、軍管、軍訓等項任務下達了具體的指示。3月19日，中共中央再次作出《關於集中力量執行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任務的決定》，首次將「三支兩軍」作為一個整體，向全軍各部隊提出。此後，「三支兩軍」便奉命逐步在全國各地展開。

以上是毛在文革中，讓軍隊直接介入地方，執行「支左」任務的經過。從這一經過看，在文革最初階段，毛並沒有讓軍隊直接介入地方事務的打算，甚至對軍隊內部的文革都作過種種規定。¹⁰但文革進入「奪權」階段後，由於遭到來自原體制內當權派明裏、暗裏的抗拒抵制，光靠五花八門造反組織的衝殺，要想順利完成各地的奪權，並使之鞏固下來是不可能的，這使軍隊介入地方文革成為必然。這是毛作出軍隊執行「三支兩軍」任務重大決策的根本原因。顯然，為了保證文革「奪權」目標的實現，毛準備讓人民解放軍再次發揮「無產階級專政柱石」的作用，用軍隊去對政敵形成威懾力量，並使軍隊作為支撐亂局，維持秩序的穩定因素，用支工、支農來維持經濟秩序，軍訓來管束紅衛兵、造反派的紀律，用軍管來保障社會秩序的相對穩定。但「槍桿子裏面出政權」本是毛的信條，毛在不得不利用軍隊來實施對文革走向進行控制的同時，對軍隊在「三支兩軍」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尤其是帶來毛本人對軍隊控制力的削弱，仍保持了高度的警覺。

事實證明毛的警覺也並非多慮。軍隊直接介入地方文革，執行「三支兩軍」任務，給軍權的擴張造成了極好的機會。文革開始後，毛由於打倒劉、鄧的需要，已幾次借用林彪對軍隊的調動和指揮，對北京及其周邊地區實施有效控制，從而為摧毀北京市委「獨立王國」，以及取得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和10月中央工作會議上對劉、鄧的勝利起到了關鍵的作用。然而，毛、林的這一聯手，也就此開了中共黨內以軍控政的惡劣先例。而自從軍隊奉命「支左」後，軍隊的權力更可以名正言順地向各個領域、各個部門伸張，這對直接掌握軍隊指揮權的林彪來說，實在是千載難逢擴張自身勢力的良機。人們也許要問，文革開始後，林彪已經取得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何以還對「擴張勢力」如此熱衷，是否表明了林早就存有「篡黨奪權的野心」。但筆者認為，不能這麼簡單的下結論，從筆者的分析來看，林在文革中急切地想藉軍隊「支左」之際擴張自己的勢力，同時在奪權後建立的新政權中部署自己的人馬，「個人野心」或許有之，但更多的是出自對自身權力隨時可能失去的恐懼。為甚麼這麼說？首先，從林當時在黨內、軍內的處境來說，雖貴為「副統帥」，但林心裏很清楚，自己實際上是很孤立的。在黨內，林在鼓吹對毛的崇拜和支持毛對政敵的清洗後，實際上也把自身推倒了與多數黨中元老對立的位子上。在軍中，雖然林在文革之初，利用毛的力量，拔掉了他的「眼中釘」羅瑞卿，但提升上來的楊成武、肖華等一應人，是否就能完全忠

於林，也有待於考驗。林彪身為國防部長，多年將將、將兵，在解放軍系統中屬四野譜系的是不少，¹¹但軍隊中從中央到地方，除四野外，其他譜系的勢力也不在少數。¹²文革開始後，軍隊中這些非林譜系的軍事人物由於羅瑞卿、賀龍一些老師的相繼被打倒，不少人受到牽連和衝擊，尤其是「二月逆流」被粉碎後，軍中不免人心惶惶，而文革一年來地方幹部慘遭批鬥的現實，也讓軍隊系統這些非四野譜系的將領開始人人自危，如果察覺到他們也將被成為「革命」對象，很難說沒有奮起抗爭的念頭。¹³如果仍由這些人掌握軍權，林彪是不會放心的。因此，在搞倒「老師」的同時，進一步瓦解和清除他們在軍隊中的老關係、老下級，以保障自己對軍隊的絕對控制和指揮，乃是林勢在必行的事。此外，也許是更重要的，是林對毛的戒心。林不僅是軍事幹才，也是「玩政治」的天才，他深諳韜光養晦的藝術，知道怎樣才能博得毛的歡心和信任。他研究「政變經」多年，當然也不會不知道「權重震主」、「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何況，林跟隨毛多年，深知毛的為人。為避免與毛的其他「親密戰友」同樣的下場，作為軍事幹才和政治「天才」的林彪在熱烈「擁毛」的同時，也不能不為自己預留後路。¹⁴而要留後路，作為軍事家的林彪深知，單純的消極防禦是無濟於事的，只有積極防禦才是唯一可能的出路。而積極防禦最有效的辦法就是盡可能地在軍隊中擴張自己的力量，部署下自己的人馬，使軍隊真正成為「你締造，我指揮」的林氏天下。¹⁵這樣，在毛可能不需要他，甚或準備貶謫他時，就不能不有所顧忌。

林彪這位曾被史達林和毛稱為「赤色鐵碗」和「無與倫比的元帥」的人物，在捕捉戰機上確實有他的過人之處，文革開始後，林彪已借毛的手，為自己清除了軍中的幾個主要對手。下一步，作為林來說，當務之急是廣植親信股肱，加固和擴張自己的權力。而毛的文革步驟，無疑為林實現自己的戰略意圖提供了絕好的機會，對此良機林是絕不會坐失的，從現在所見資料來看，在1966年底到1967年上半年，林彪已從三方面打開缺口，並迅速擴張了戰果：第一、用支持「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做法，對軍隊中非林勢力發起衝擊，利用反「二月逆流」，¹⁶實行軍隊高層大換班，進而控制了軍委各重要部門和主要兵種，初步拼湊起了以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黃永勝、葉群為核心的「林家班底」；¹⁷第二，利用文革「奪權」，慫恿造反派組織把攻擊矛頭指向各大軍區中非林派系的主要領導，在各地出現軍區「支左」部隊和與「造反派」組織的爭端和對立後，再抓住軍區領導「站錯隊」的錯誤大做文章，設法把造反之火燒向軍隊，假「中央文革」，也即毛之手，將不聽命于林的大軍區負責人撤換或打倒。¹⁸應該說，林彪的這一策略也是相當成功的，從現紅衛兵、造反派刊物中可以確知，隨著「支左」的展開，在1967年上半年中，除北京、上海以外，全國不少地區，如四川、新疆、河南、廣東、福建、遼寧、陝西、內蒙、西藏、青海等地，都出現了得到軍隊支援的「保守」組織與得到首都造反兵團支援的地方造反組織嚴重對立的現象，¹⁹其中不少地區還相繼發生了由軍區直接出動軍隊彈壓造反派的惡性事件。²⁰而作為受壓一方的造反派，則由此進一步確信文革已開始進入衝擊軍隊，解決軍權問題的新階段，準備隨時為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英勇獻身，並隨時準備與這些「拿槍的劉、鄧」決一死戰，²¹而這正是林彪實施下一步戰役所需要的效果；第三，利用軍隊「支左」，把軍隊勢力滲入至地方各級組織、各個部門、造成一國之中軍權的至尊地位。自1967年1月「奪權」開始後，由於造反派的衝擊，地方各級組織已基本癱瘓，這使林彪看到了由軍隊來填補權力真空的機會。由於軍隊負有支持「左派」奪權的任務，在「奪權」實現後的新的各級政權機構-革命委員會籌建中，軍代表乃事實上一言九鼎的人物。尤其是在「三結合」班子人選問題上，群眾組織的代表是點綴（上海除外），被「結合」的幹部更是附庸，解放誰、結合誰、打倒誰，統由「支左」的軍代表一錘定音，軍隊簡直就成了「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化身。儘管這些新的政

權班子的權柄並非都控制在林系人馬手中，但這僅是第一步，只要軍隊以後都能聽命於他，那麼軍隊管制下的地區也就將是他的，並且由此最終能達到對整個國家的軍事控制。這時的林，是否就有了取毛而代之的野心，恐怕也未必，也許他把毛視作了愷撒，希望自己能成為克倫威爾，²²即便當不成克倫威爾，也不至於像毛以前的所有「合作者」、「二把手」一樣，落個被拋棄、貶謫，甚或被打倒的下場。作為軍事家的林彪同樣不失政治家的精明，他走的這步棋，在軍事上叫「佔領戰略先機」，在政治上則是在激流勇進的同時，起碼也為自己預謀了全身而退之路。而所有完成的這一切，統統都是在毛的旗號下進行的，都是不折不扣地忠實貫徹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這正是林彪地高明之處。

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林彪的企圖可以瞞過所有的人，甚至還利用了江青，²³卻很快被毛澤東所察覺。毛對林的戒心其實從開始合作起就一直是有，毛重用林彪，但不相信林彪，1966年 月給江青的那封信就能說明這一點。「一月風暴」後，起初毛由於「奪權」心切，對軍隊介入地方後「支右不支左」很惱火。於是批閱了一系列檔，強調解放軍一定要支持「革命左派」。²⁴ 在「二月逆流」發生後，毛在「無產階級的震怒」之下，又親自出馬，喝斥了哪些還敢於發牢騷的「老帥」，讓他們統統「靠邊站」，從而也對下面部隊產生了震懾作用，以扭轉軍隊「支右打左」的趨向。然而，當毛意識到林正在打他的旗號，幹自己的勾當，且有目的地自樹勢力時，多疑的毛立即提高了警覺。為未雨綢繆起見，毛開始不動聲色地採取防範措施。1967年3月中旬，中央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集軍委擴大會議，在這次會議中，徐向前跟林彪發生激烈爭吵，徐提出許多爆炸性的問題：1、要求重新調查「聯動」的性質；2、要求為「二月逆流」幹將-副總理譚震林平反，恢復名譽；3、反對林彪為毛的接班人。雙方爭持不下，以致會議中途休會。²⁵徐向前是四方面軍出身，曾有與張國燾的合作史，雖列名十大元帥，但是最受冷落的人物，這次由他挑頭，反對如日中天的林彪，並且是反對林為毛的接班人，如無強大後盾，很難想像。但徐的後盾是誰呢？是毛還是反林的軍中勢力？從情況分析，更可能是毛，這從嗣後發生的情況中可得到證實。軍委擴大會後不久，在會上挨了批的徐向前對毛說：「身體不好，全軍文革小組組長請由肖華接任。」毛答道：「不，還是你來做。」以後，徐雖去職，但並未受嚴重處分，也未被揪鬥，能夠使他免於厄運的只有毛。而且就在會後不久，徐在會上的部分主張竟很快得到實現，如4月22日，由毛親自下令，江青親自傳達，先前被逮捕的「聯動」130多個頭頭都被釋放，並被允許活動。²⁶1967年5月1日，毛在天安門上對董必武說：「檢討幹部的時候，必須是全面的、歷史的。今天除了劉、鄧，都來了。各省的第一書記必須使他們回任工作。江華、江渭清、譚啟龍、不是三反分子。陳丕顯無論是思想和工作都變了，必須充分改正。廖承志已經過了關，必須使他過關，農墾部長王震不是三反分子，只是一個暴躁的人，餘秋裏說了錯話……」。顯然，毛已開始採取措施，設法重新收攏人心，比如用「要解放老幹部」來彌合他與舊日「老同事」因文革而生的嫌隙。在軍隊中，也有意識地啟用和重用非林派的實力人物，以分散林的軍權。²⁷ 1967年4-6月，由於在各地奪權和軍隊支左過程中，不斷發生造反派衝擊大軍區的事件，兩派群眾對立和武鬥的身後，已明顯能看出軍中不同系統之間的矛盾。²⁸毛於是以督飭「支左」為名，派中央文革小組大員分赴各地視察，以摸清底情，但來自各路的彙報，似乎使局勢更加撲朔迷離，毛於是決定親自去看一看，只有掌握了真實的情況，才能有相應的對策，下應對的決心。這就是武漢「七·二〇事件」前夕，毛來到武漢的背景。²⁹

二、武漢「七·二〇事件」真相

如上已述，「二月逆流」被擊退後，老帥威風被打下去了，下麵的人馬不服氣，加上林借機在軍隊中排除異己，搞的軍隊系統一些原來不屬於四野，或歷史上與林彪有過節的軍人人人自危，而這些人手中都實實在在握有軍權，對林彪在軍中的排斥異己有警惕，要想像搞垮那些地方「走資派」那樣收拾他們就不那麼容易了。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就是這樣的一位軍人。³⁰

陳再道，少時即與許世友、錢鈞一在河南嵩山少林寺習武練武。參加革命後，在徐向前手下，歷任紅四方面軍（徐向前）排長、連長、營長、團長、師長、軍長，1937年抗戰爆發後，任八路軍東進支隊司令員、冀南軍區司令員、二野第二縱隊司令員。解放後任河南省軍區和武漢軍區司令員。從陳的經歷看，陳跟徐向前、鄧小平都有很深的歷史關係，跟林彪則無關聯。不僅如此，據陳再道自述，在林當國防部長期間，因討論「戰略方針」時，與林有不同看法，在對「大比武」等的一些問題的認識上，也沒有站在林一邊，相反支持了羅瑞卿，再加上對林總是「緊跟」不夠，這些都曾引起林的極大不快。³¹而讓這樣的人繼續手握重權，雄踞一方，顯然是林所不能容忍的。不僅如此，林要把文革之火燒向武漢軍區，燒向陳再道，還有著更大的目標，那就是扳倒徐向前。文革開始後，不少老帥相繼倒臺，不倒的也「靠了邊」，向來受到冷落的徐向前反而被委以全軍文革小組組長的重任，而全軍文革小組又負有指導全軍文革的重任。³²林彪要控制軍隊，握掌軍隊文革的主導權，與其積不相能的徐帥便成了林的眼中釘。尤其是「京西賓館事件」後，林實際已覺察到徐背後毛的撐腰，於是更加重了必欲去之而後快的決心。林歷史上打過很多「迂迴包圍，中心突破」的漂亮仗，這次武漢軍區的陳再道顯然是林選中的「突破口」，林要在這裏攻破缺口，再打一場扳倒徐向前，取得全軍文革小組領導權的縱深戰役。

要把陳再道搞倒，林彪一夥可以利用的是首先「造反派小將」。自「奪權風暴」刮起後，北京各院校的大批造反派，在中央文革支持下，打著「革命串連」的旗號，到各地煽風點火，武漢是他們活動的重點地區之一。在他們來到武漢時，武漢與國內很多地方一樣，文革後成立的群眾組織也分成了「革」與「保」兩派，在「革派」中，最大的造反組織叫「工人總部」³³，「保派」中最大的組織則為「百萬雄獅」。兩派互相對立，而陳再道為首的武漢軍區支左部隊，則比較偏向「保派」，拿陳再道的話來講「甚麼造反派，都是些二流子，一有風吹草動，這些人不投降臺灣是鬼變的。」³⁴在聽到漢口的《長江日報》紅旗大樓被造反派佔領，南下造反派與武漢造反派聯合，在《長江日報》上發表「丟掉幻想，投入戰鬥」、「全武漢、全湖北要大亂、特亂、亂深、亂透」的所謂《2·8聲明》後，陳再道以「武漢軍民」強烈要求武漢軍區對《2·8聲明》表態為名，2月18日，以軍區黨委名義發表了《2·18嚴正聲明》。並在3月17日，以貫徹《軍委八條》為名，出動軍區部隊，抓了造反派組織「壞頭頭」400多人。21日，發表武漢軍區《通告》，宣佈解散「工人總部」及其所屬組織。在文革最初介入地方支左時，對「造反派」組織抱同樣看法，並採取同樣做法的大軍區領導，並不在少數，這就給了林彪一夥以打倒他們的口實。

林彪一夥要搞倒陳，還利用了武漢軍區內部的反陳派，最能說明問題的就是指使武漢軍區副司令李希迎造陳再道反的事件。2月6日，也即「一月風暴」後不久，武漢軍區副司令李希迎就在自己家中召集了軍區15個幹部開了一個秘密會議，會上李為鼓動在座人向軍區主要領導奪權，交底說：「我不敢說，我不是個人奪權，是為軍委奪權，奪權要軍委批准。」李的這番話無非表明他召集大家開會討論奪權是有來頭的，是奉上面指示行事的。更有意思的是，他在召集這一會議時，在自己帽子底下按放了一微型答錄機，把在場的一問一答都錄了

來。³⁵ 在開過此會後，李希迎乘陳再道和政委鐘漢華在北京開會，自己把軍區常委找去，要他們簽字交出兵權，並在造反組織的《2·8聲明》上以「軍隊造反組織的代表」簽名以示支持。結果，在陳再道回武漢後，李希迎被鬥爭。³⁶ 軍區黨委2月18日《嚴正聲明》中也特地指出「軍隊內有些造反組織代表，在《2·8聲明》上簽字，只能代表他們個人，不能代表武漢部隊，更不能代表人民解放軍」，可見兩派對立之激烈。

在這種背景下，武漢兩派對立不斷升級，尤其是進入4月份後，武鬥更是愈演愈烈，據武漢來北京的造反派大字報獲知，僅4月27日到6月3日一個多月中，武漢就發生武鬥120多次。6月4日到15日，11天內發生武鬥80餘。而從6月16日到24日，8天內武鬥發生50餘次，在武鬥中被打死的人有350餘人，重傷1500多，輕傷者1萬5千餘，參加武鬥的工人、農民達5萬多人，使2400餘處工廠停工。³⁷ 而武鬥中，被打壓的自然是得不到軍區支持的「造反派」，於是在北京造反派組織支援下跑來中央告狀，中央的「文革派」人物紛紛出面接見。4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正確對待革命小將》的社論，警告武漢、成都等地的軍隊領導，不要壓制造反派和紅衛兵。4月6日，林彪並以軍委名義下達了《十條命令》。這兩個東西出來後，武漢的造反組織有如注入強心劑，再次向軍區發起衝擊，街上出現「粉碎武漢地區的三月逆流」、「揪出武老譚，解放全中原」的大幅標語。但老軍人陳再道也不買賬，拿他的話說「心裏窩火就要往外冒」，於是不僅繼續毫不手軟地在武漢抓捕「混進革命群眾組織的壞分子」，甚至在北京參加軍委擴大會議的小組會上，還發言「建議中央文革小組擴大一點，多吸收一些同志參加進去，以便讓各地都有代表」。³⁸ 陳的話立即被整理成簡報，說成「妄圖改組中央文革」，成了秉承林彪意旨辦事的中央文革一幫筆桿子王力、關鋒、戚本禹、林傑等人攻擊陳再道的把柄和口實。³⁹ 於是上面輿論開始明顯向不利於陳再道的方向發展，6月26日中央文革小組辦事處和全軍文革小組辦公室聯名給武漢軍區發去電報，認為：「最近武漢市發生大規模武鬥，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漢軍區立即採取有力措施制止武鬥。百萬雄獅一些人對若干院校和工廠的圍攻，應立即停止，殺害革命群眾的兇手，應按照中央《六·六通令》嚴肅處理。不久之後中央將請武漢軍區和各派群眾組織的代表來京彙報。」……局勢完全按林彪所預設地那樣發展著，一旦條件具備，不管你陳再道如何強硬，都只有乖乖交出軍權一條路，不然就是「不投降就要你滅亡」了。然而，就在這個時候，毛澤東親自來到了武漢。

毛是7月14日晚上到武漢的，隨同毛一起到武漢的有楊成武、鄭維山、汪東興，周恩來早毛一天到達，並在到達後即打電話給其時正與王力一起，在重慶執行雲、貴、川視察任務的謝富治，讓他到武漢來接受「緊急任務」。但為甚麼王力也跟謝富治一起來武漢，有著不同說法。按陳再道所說「王力的武漢之行是莫名其妙的」，是王力和關鋒打電話「密謀」後，「硬要打著『中央代表團』的旗號到武漢的」。⁴⁰ 對此，王力後來寫文章做了反駁和澄清，指出陳說中不符合事實之處，說他到武漢也是事出突然，與關鋒通電話正是為了想知道，停止他們一行在西南的視察而突然要他們都去武漢的原因。而要他們一行都去武漢的動議是謝富治向總理提出，得到總理同意的。⁴¹ 由於王力將是下一幕「七·二〇事件」的主角，那麼誰讓王力去武漢的，對認識事件的真相就不無意義。在以上兩種說法中，筆者認為陳再道的說法是有明顯漏洞的：一、總理電話通知謝富治是讓他去武漢「接收緊急任務」的，謝是公安部長，總理給他下緊急任務，若沒有通知王力，王力是不可能要求「硬要去」的。但凡對中國高層運作規則稍有瞭解的人都不會相信這種說法；二、同去武漢的除謝、王外，還有餘立金和北航的四個紅衛兵，他們難道也是「硬要去」的嗎？三、陳說王力到武漢是打著「中央代表團」的旗號，這完全是一種毫無根據的指控，王力不可能蠢到在主席、總理面前打甚麼「中央代表團」旗號的地步。再看王力的說法，應該說也是有問題的，因為一般來講，如

果謝富治所接總理電話僅是要他本人去武漢接受「緊急任務」，而且是「保衛主席安全」的任務，那麼有甚麼必要和可能主動向總理請示讓王力，甚至讓隨行的紅衛兵都跟他一起到武漢呢？是讓他們一起都來執行「保衛任務」嗎？那麼，究竟是誰能有權讓王力一行都去武漢呢？筆者認為，只能是周恩來。也許周不願意讓人產生他讓王力去武漢的聯想，所以周在要謝與王一起來武漢時，指令下給了謝富治，通過謝的轉達，並讓王力認為完全是謝的提議。不過，如果這一分析成立，身為總理的周恩來又為甚麼要這樣做呢？這是一個疑點。聯繫以後的事態進展，在整個「七·二〇事件」中，周恩來一直是一個若隱若現的重要人物，他不是主角，但勝似主角。他不在旋渦中心，但又始終操控著全盤，何以能這麼說？我們將在對事件全過程作出梳理後，再作進一步說明。

謝富治、王力是14日中午到武漢的，但當天謝、王到武漢的消息就轟傳了武漢三鎮。消息怎樣傳出去的，按陳再道的說法，是「由於王力擅自到武漢大街上去看大字報」，結果給群眾認了出來。對此，王力的說法是：「當天謝富治闖了禍，他非要到街上去看大字報，我們從重慶來的人一起跟著他去了，結果我們被人發現了。……我們馬上報告了總理，問怎麼辦？總理說這也有好處，群眾正在懷疑為甚麼東湖賓館的電燈亮了，這樣正好說謝富治、王力、余立金三人到了武漢，要就地解決問題，以便掩護主席。」總理並當即親自通知武漢軍區支左辦公室，讓他們向群眾公開宣佈「謝富治、王力來武漢解決文化大革命問題」的消息。⁴²以上兩種說法，不同在於當天一到武漢就提出到街上看大字報的是謝還是王。筆者認為，一般來說，上街看大字報的主張，出自謝提議的可能性要大於王，因為兩人中，謝富治是副總理兼公安部長，王力儘管是「文革紅人」，但他仍只是謝富治的隨從，中國官場上外出行止一般均以高一級的領導意旨為依歸，如果說王力是「擅自」的話，謝富治跟著王力去又怎麼解釋呢？王力說上街看大字報是出自謝富治的「非要」，當然也有王推卸責任的嫌疑，但在邏輯上倒是說得通的。然而，如果王力的說法能夠成立，在聯繫「七·二〇事件」前後謝富治的角色，不僅令人聯想到當今設圈套騙人中的「托」。而總理當即決定向群眾公開宣佈「謝富治、王力來武漢解決文化大革命問題」的消息，儘管合情合理，天衣無縫，但也令人感到總理似有把動靜搞大的嫌疑。

接下來的幾天是毛澤東在武漢開始聽取各方的彙報。15日，謝富治、王力彙報了他們在雲、貴、川視察的情況，以後又一起討論了武漢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針。這時毛對武漢問題所作的指示是：「要給工人總部平反，放掉朱鴻霞。『百萬雄獅』是群眾組織，謝富治、王力要派專人做他們的工作。軍區對兩派都要支持。」⁴³從這番話看來，毛的態度是不偏不倚，毛顯然需要的是穩住各方，他才可以從旁從容觀察。在毛聽取彙報的同時，由周恩來主持召集武漢軍區師以上支左單位負責人開了一個軍區黨委擴大會，18號晚，周恩來準備回北京，臨行前毛讓周帶陳再道、鐘漢華到他那裏，作了一個小範圍的談話。關於談話的內容，《陳再道回憶錄》中是這麼說的：「主席一見我們就問『你們怎麼樣啊？』我心思沉重又有點氣鼓鼓地說『我們不承認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毛笑著說『這怕甚麼呀？現在他們一提就是方向路線錯誤，誰都是路線錯誤。』毛並對陳、鐘兩位說：『我要他們做工作，做工作做到不僅打不倒你們，而且擁護你們為止。』由於陳再道的回憶中關於這次召見的內容提到的僅片言隻語，但就從這兩句對話來說，就很耐人尋味，首先毛講話所說的「一提就是方向路線錯誤」的「他們」指的是誰？顯然這個「他們」的做法毛並不贊同，所以毛才用了「誰都是路線錯誤」這樣不屑的口氣。第二，毛的這次召見，顯然毫無指責武漢軍區主要領導「犯錯誤」的意思，反而是為了給他們吃定心丸的。陳再道在他的回憶錄中談到了這樣的細節，說：「總理為了消除我們的顧慮，在召見他們之前就告訴鐘漢華說：『主席臨動身時就講

了，要到武漢去，保陳再道去』。」這裏周恩來代毛交了底，意思是讓陳、鐘不用擔心，有主席在，他們就不會被打倒。⁴⁴陳並回憶說：談話結束，告辭出來時，主席叫來了幾位服務員，對他們說「再不能打倒你們司令員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接著又轉向陳說：「他們要打倒你，我要他們打不倒你！」⁴⁵這裏主席的話顯然是一句雙關語，對服務員講是假，對陳再道講是真。也就在這次召見後僅一天，「七·二〇事件」發生了。

所謂「七·二〇事件」是指武漢地區得到軍區部隊支援的「百萬雄獅」組織，衝進東湖賓館，毆打和抓走中央文革代表王力，後被林彪一夥稱為「武漢兵變」的事件。關於此一事件的真相，由於站在不同的角度，敘述的版本很多，但又都因各自的利害關係，隱去了關鍵的情節和事實。這裏，我們不妨仍以事件主要當事人陳再道、王力各自的說法為基礎，對事件眉目作一番重新考察和辨析。

「七·二〇事件」的導火線，按陳再道的說法，是謝富治、王力一行18日晚在水利電力學院的活動。⁴⁶既然是導火線，這把火是怎樣被引燃的，對透視事件真相無疑是有意義的。我們先看陳再道的敘述：「18日夜裏，謝富治和王力帶著劉豐等人，到機場送走總理，隨後直接從機場溜到水院造反派總部，他們佩帶著造反派的袖章，視察據點、工事，慰問武鬥致傷人員，並先後在大會上講話。」⁴⁷而這些講話，第二天被造反派在武漢三鎮到處播放，從而把「武漢軍民肺都氣炸了」，於是引發了其後一連串的事件。⁴⁸陳再道以上說法顯然有太多的情緒色彩，不是一個客觀的敘述，如「佩戴造反派袖章」等說法，乃明顯的無根據之說。對此，王力的說法則是：那天晚上送走周恩來後，謝富治提議去水院，「謝說新華工去過了，『百萬雄師』總部也去過了，就是這一派沒去，應該去」。⁴⁹於是謝、王一行就去了武漢水院，那裏是鋼工總的總部。在那裏，他們一行都有一個不長的即興講話，內容基本遵循了幾天會上「中央確定的方針」。⁵⁰王力的說法雖然有事後為自己洗刷和辯護的嫌疑，但筆者認為在邏輯上尚講得通。筆者查閱了他們講話的內容，雖然表示堅決站在「造反派」一邊，但仍強調了要「停止武鬥！」，要「擁軍愛民」，這些講話在當時實屬平常，即便有煽動性，也並非如陳再道所說那麼出格和「瘋狂」。尤其是在發表講話的5人中，平心而論王力的講話並不比謝富治等人更高調，何以就在次日清晨起，武漢全城大街小巷就會鋪天蓋地貼滿了聲討王力一人的大字報和大標語呢？其二，王力提到了當晚去水院乃謝富治的提議，之所以每個人都講了話，也是謝讓大家都講一講的，此點非王力一面之詞，陳再道的敘述也可作印證。⁵¹其三，謝、王一行到水院的時間，已近19日凌晨，而武漢街頭巷尾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從早上就開始出現，即便是王力講話「激怒了武漢軍民」，但反映如此之快，矛頭如此集中，行動如此一致，無論如何也是令人生疑的。據此，筆者認為陳再道關於謝、王一行18日晚在水院的活動引發「七·二〇事件」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七·二〇事件」不是一個偶發性的事件，而是一個經精心策劃的預謀。這點還將在事件整個過程中進一步被證明。

以下的史實是眾所周知的：

7月19日，如陳再道所說的：「當天聲討王力的大字報貼滿了武漢街頭」，一篇題為《王力究竟是人是鬼——深思幾個為甚麼》的大字報甚至有「挖出這顆埋在毛主席身邊定時炸彈」的提法。而這一切發生時，王力還蒙在鼓裏，當天日下午，王力按既定計劃參加軍區召開的師以上幹部會議，是會謝富治的任務是傳達總理講話精神，王力是講理論，軍區希望他們能「出面做工作」，王力於是自稱「我只好象給小學生上課一樣，從一年紀的第一課講起……」，再用陳再道的說法是「滔滔不絕，一直講到夜裏11點」，而這時外面「百萬雄

獅」已經開始行動了。⁵²20日凌晨，也就是在王力回東湖賓館後不久，「百萬雄師」和獨立師、二十九師的戰士，開著上百輛大卡車和幾十輛拉著警報的消防車一起出動。回東湖賓館不久的王力被沖進東湖賓館的「憤怒」的軍民抓走。關於這個過程，陳再道是這樣說的：「7月20日清晨，我來到謝富治房間，剛剛坐下，百萬雄獅就沖進來了，他們擠在門口要找王力。我和謝富治站起來，勸他們到外面去談，而王力卻在隔壁房間裏不敢出來。……正在這時，又沖進來幾百人，多數是獨立師和29師的戰士，他們在軍區大院等急了，憤怒地喊著要抓王力，並且把我當作王力，上來就是一頓槍托，王力乘亂跑進屋裏，百萬雄獅和戰士找到他後，請他到軍區大院去回答問題，王力賴著不走，北航紅旗幾個人又大耍造反派的威風，氣勢洶洶的辱罵他們。他們忍無可忍，硬把王力抓出來，塞進汽車，拉到了軍區大院。謝富治有塊老幹部的牌子，他們連碰都沒碰一下，總理的住處離謝、王的住處僅隔百米左右，他們連去都沒有去，主席那邊就更不用說了，當時和事後檢查，根本沒有絲毫危及主席安全的跡象」。王力被抓走後，帶到軍區，押進4號樓3層一間6平方米小屋，因拒絕簽字承認「百萬雄師」是「革命群眾組織」被打斷踝骨。而這時的武漢街上「數千輛大卡車載著工人、農民和軍人，排成四路縱隊，舉行『打倒王力』的示威遊行」，此遊行一直持續到23日，⁵³這就是當時震動全國的「七·二〇事件」。對於這一事件，陳再道至今為止的記述都仍然想把它說成是自發的事件，但陳是個軍人，說話直筒子慣了，在需要用謊言掩飾真相時顯得很笨拙。就從他現在寫的這段不長的敘述中，不是明眼人也能讀出裏面的種種破綻。比如說戰士沖進來，把他當王力打了一頓，這個「苦肉計」也編得太離譜了，既是獨立師和29師的戰士，會不認得司令員？再如跟王力一起的謝富治，連司令員都得「挨槍托」的戰士和群眾就會因為他是「老幹部」，就能毫髮無損？王力不也是「老幹部」嗎？當然，距之不遠的主席住處更是絕對不能逾越的禁區，不被驚動正說明了所有這一切都是嚴密控制下進行的。然而，所發生的這一切為甚麼陳再道，包括王力，乃至「七·二〇事件」涉及者，都似一致在刻意掩飾事情的真相呢？難道作為當事人的他們，即便事發時並不一定就清楚事情因何而起（面授機宜者除外），事後難道也沒有疑惑嗎？筆者認為顯然不是的，他們之所以回避真相，只能用切身的利害關係來解釋。「七·二〇事件」的真相，暴露的是中共高層權爭，暗中較勁的人物又是「統帥」和「副統帥」，不管他們的矛盾公開與否，「天機」都不可泄，否則實在太有損偉大領袖和黨的形象，罪莫大焉。⁵⁴

讓我們再回到事件上來，現在可以直接揭示這一事件發生後幕後展開的一切了。「七·二〇事件」突發後，林彪最初並不疑有人設「套」，還以為找到了打倒陳再道的藉口，於是立即行動起來，先把此事件性質定為「兵變」。20日上午，林彪親自給毛寫信，讓中央文革中的筆桿子戚本禹、陳伯達、關鋒幫助一起修改，⁵⁵最後還簽上江青的名字。此信由邱會作趕去武漢面呈毛澤東。信中的主要意思是說：外面形勢不好，毛的安全受到威脅，要及早轉移，其實是設法讓毛離開武漢，他們方可放手行動。與此同時，鎮壓兵變的軍事部署也在積極進行。林彪手下的空軍傘兵部隊兩個師已接到命令火速向武漢馳援，⁵⁶海軍東海艦隊接到李作鵬讓海軍黨委拍去的電報，稱「七·二〇事件」是「反革命兵變」，要他們表態「打倒陳再道」。李作鵬並親自指揮，在武漢王家墩機場設立了三軍指揮部，南空的江騰蛟也奉命匆匆趕到武漢。⁵⁷21日，林彪親自登上東海艦隊某艦，並給指戰員作了報告，稱陳再道是「三反分子」，要求武漢部隊堅決支持左派。次日，東海艦隊發表《嚴正申明》：「我東海艦隊嚴陣以待，隨時準備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亂！」⁵⁸武漢軍區一部也宣佈脫離武漢軍區，聲稱要把軍區「領導統統打倒！」⁵⁹武漢「百萬雄師」對立面的造反派組織，則象預先有知一樣，緊急動員起來「堅持鬥爭，等待著支左解放軍的到來」。而更富有戲劇性的是此時被

「百萬雄獅」抓走關押在軍區的王力突然失蹤，原來是負責看守王力的武漢部隊29師政委張昭劍陣前倒戈，將王力救出，轉至小洪山空軍司令部保護了起來。⁶⁰與此同時，武漢軍區陳再道的部隊也在趕築防禦工事。⁶¹雙方劍拔弩張，火拼一觸即發。

在所有這一切發生時，真正的幕後人毛在幹甚麼呢？事件如所料的那樣發生了，毛需要從武漢局勢下一步發展中觀察「對手」的動靜和反映。但林已以「騷亂會危及毛的安全」為名，直接由國防部下令讓毛從武漢轉移上海。毛堅持不走，稱「我寧可被抓」。⁶²但就在20日當天下午，周恩來坐飛機趕到，在與周的談話後，毛同意離開。21日凌晨，周恩來親自佈置毛澤東由東湖賓館後門轉移，用掛武空車號的汽車送到王家墩機場做飛機去了上海，這在毛是非常破例的。之所以如此做，顯然是為了不讓林覺察到毛、周對他已有戒備。但毛對被迫離開武漢很是惱火，據張春橋1974年在京西賓館的一次講話中透露：「主席到上海後，一夜沒睡覺，把張春橋等人叫到身邊。主席說，不是他們說的那樣吧？如果陳再道搞兵變，我能走得出來嗎？這都是他們搞的。我在那裏，為甚麼不和我通氣呢？」⁶³毛話中的「他們」指得是誰，顯見在這時的毛、張之間已經是心照不宣了。

周恩來也是在事發當天下午緊急趕到武漢的。周到武漢後做了三件事：一、保護毛安全轉移；二、找王力的下落；⁶⁴三、召開武漢軍區幹部會議，想通過斡旋，平歇風波。拿陳再道的話說，就是「先讓武漢軍區承認錯誤，保我和鐘漢華過關」。⁶⁵但林派人馬豈肯甘休，正要抓住此事大做文章。面對這一局面，周恩來的意圖沒有達到。

7月22日，武漢事件中「遭迫害的英雄」謝富治、王力回到北京。為了大造輿論，林彪讓在京的中央文革組織了數萬人去機場歡迎。林彪並於當晚，親自主持了有中央文革全體成員參加的會議，聽取謝富治的彙報。會議決定：把「七·二〇事件」定為「反革命暴亂」，處理這一事件分兩個步驟：第一個步驟，以中央名義調陳、鐘進京，看他們敢不敢來，如不敢來，證明陳、鐘有問題，便可名正言順的討伐；第二個步驟，起草關於武漢問題的中央文件，開一個百萬人的歡迎大會，並通知各地舉行集會和遊行示威，聲討「七·二〇事件」，把「揪軍內一小撮」的聲勢造大、造足。按照這一部署，次日晨5點20分，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送謝、王「勝利回京的喜訊」。全國各地報刊均以頭版頭條刊載北京機場對謝、王回來的盛大歡迎的消息和照片各地造反派也舉行了大規模集會、遊行，表示對王力和中央文革的支持和慰問。與此同時，武漢軍區也收到了要陳再道、鐘漢華進京開會的電報。24日凌晨三時多，武漢軍區陳再道一行15人飛抵北京，⁶⁶住進京西賓館，而賓館外，「三軍造反派」已聞聲而到，在葉群的親自佈置下，打倒陳再道、鐘漢華，揪出「黑後臺徐向前」的大標語佈滿了北京街頭。造反派並曾試圖抓走陳再道，但在周恩來的保護下未得逞。25日下午，天安門召開百萬軍民大會，鬥爭陳再道。林彪出席講話：「堅決打倒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提出「要批判帶槍的劉鄧路線。」

26日上午，召開中央常委擴大會議，處理武漢事件，十大軍區負責人到北京參加，會議由周恩來、陳伯達、康生主持。會上吳法憲等一再叫嚷要查陳再道後臺，當然首先指向是徐向前，徐向前寫張條子給周恩來，憤然離開會場。陳被坐「噴氣式」，還被吳法憲打兩耳光。武漢獨立師師長牛懷龍被吊打審問，要求交代陳再道交代過甚麼任務，當然牛的回答是「我死也不能說……陳司令沒有交代別的任務，就是要我好好保衛毛主席。」⁶⁷

27日，林彪一夥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的名義，發出了《給武漢市革命群眾和廣大指戰員的一封信》，信稱：「你們英勇地打敗了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派地極端

狂妄地進攻。」同日，林彪親自主持會議，撤銷了陳再道和鐘漢華的職務，調北京批鬥。也就從是日起，《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開始每天各自發表社論，相互轉載文章，把「揪軍內一小撮」由暗中活動轉為公開號召，煽動「揪出帶槍的劉鄧」，並在全國各地開始掀起「揪陳再道式人物」的狂潮。

「七二〇事件」發生不久，林彪曾在講話中說了這樣一句話，林說：「以前我正愁沒題目做文章，現在他們給我們出了題目，我們要大做文章。」⁶⁸從上述情況來看，在「七二〇事件」後，林彪抓住題目，大做文章，應該說斬獲頗豐。但也因「擴張戰果」過於操切，給毛看出名堂，於是文革中的毛、林「蜜月」走到盡頭。

三、「七·二〇事件」後毛、林相爭的格局和矛盾的升級

「七·二〇事件」後，由於有了正面衝突，矛盾趨於激化。而這時的毛已清楚看出林彪勢力在軍隊的惡性膨脹，且有尾大不掉之勢，但養虎成患，面對林彪勢力咄咄逼人的擴張，如何應對，毛一時處於兩難境地。⁶⁹與林分手或攤牌在當時局勢下都是不可能的，這不僅是由於林已掌握軍隊大權，也是由於缺乏名正言順向公眾交代的理由。因為林其時所做的一切，客觀言之，並未絲毫違背毛的文革路線和精神，反倒可以說是毛文革意圖「最積極、最忠實」的貫徹者。因為在早在一年前標誌文革發動的綱領性文獻《五·一六通知》中就已明確指出「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已混進黨裏、軍隊裏、政府和文化領域各界裏」，那麼林彪一夥在「奪權鬥爭」中把矛頭指向「軍內一小撮」，又有何不可呢？當然，更大的顧慮是由於其時毛的最大政敵和對手劉少奇及其一夥還未被徹底打倒，所謂「人還在，心不死」，全國範圍地

「奪權」也才開始，基層政權基本還都把持在劉少奇賴以東山再起的大小「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中，如果與林反目，毛不僅沒有穩操勝券的把握，而且所有的「文革理想」將統統付諸東流，而且一旦出現林、劉兩派的聯手，毛就將陷自身於萬劫不復之地。這樣的結局，毛是無論如何要加以避免的。⁷⁰既然如此，毛只好暫時收斂起他的「虎氣」，對林彪的逼人態勢暫取守勢，預防和反擊的部署只是在不露痕跡中進行。⁷¹然而，毛、周的掩飾沒有瞞過林的眼睛。「七·二〇事件」後，林很快察覺到隱匿在事件背後的身影，⁷²但這時的林也已勢成騎虎，既然自己已被毛所懷疑，按林多年與毛的共事，深知以後的下場不會比劉、鄧更好。於是對林來說，唯一的出路就是抗爭，所謂「做了過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⁷³怎樣抗爭？林彪其時的對策是一不做，二不休，乾脆搞他個天下大亂，擺出對決的態勢，把火燒大，逼毛讓步。

林彪是怎樣把火燒大的呢？首先林以搞倒陳再道為缺口，乘熱打鐵，對軍中的異己勢力展開大掃蕩。「七·二〇事件」後，林一夥首先瞄準的靶子是徐向前和他領導下的軍委文革小組，以及徐海東、彭紹輝、王新亭等一批在林看來可能成為他對手的軍隊負責人。在批鬥陳再道的會議上，徐被指為陳再道的後臺，徐帥憤而離開會場。⁷⁴第二，把打擊目標指向總政，林對手下說：總政是「水淺王八多」，成了「一筐爛梨」，「你們要戰鬥，要突擊，徹底砸爛總政治部閻王殿。」⁷⁵第三，在各地狂掀「揪軍內一小撮」高潮。林彪親自對北京的學生造反派領袖蒯大富、韓愛晶說「事情發展到壞的頂點，就要向好的方向轉化，從前我們要做文章，但沒有題目，現在他們給我們出了題目，我們要抓住大做文章。估計最近一個月將是全國矛盾激化的一個時期。」⁷⁶在林彪鼓動下，蒯大富、韓愛晶聯合召開清華井岡山和北航紅旗兩總部會議，傳達林等中央首長的指示，並為「揪軍內一小撮」，成立了「對外作

戰部」、「軍事動態組」，以及各地造反派駐清華的「聯絡總站」，準備大幹一場。⁷⁷在這股狂潮下，全軍文革小組自文革以來第三次改組，徐向前不再擔任組長，雖然取代徐組長一職的是謝富治，但下面組員中，一次比一次更接近清一色的林彪集團大將。⁷⁸肖華為首的總政被砸爛，各地大軍區也都普遍受到造反派組織的衝擊，對立兩派的武鬥事件從木棍、磚石升級為機槍、大炮。⁷⁹8月1日，《人民日報》刊登林彪為紀念抗戰二十周年寫的文章《人民戰爭勝利萬歲》。《紅旗》雜誌則發表了由林傑起草，王力、關鋒審定，陳伯達簽發的社論《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桿子—紀念人民解放軍建軍四十周年》，提出目前鬥爭的大方向是「揪軍內一小撮」。

北京發生這一切都由周恩來隨時報告給了毛澤東，毛認為倘聽憑眼下局勢繼續發展，他所擔心的事馬上就會變為現實。於是，毛覺得可以出手了。8月10日，毛在林彪送審、準備下發部隊的文件上，劃掉多處「軍內一小撮」的字樣，並對《紅旗》雜誌8月1日「社論」表示了強烈不滿，批示「還我長城」。⁸⁰8月11、12日，中央文革召集北京高校及中學紅代會代表開會，對反擊「大抓軍內一小撮」作了具體部署。也就從那時起，北京各單位開始進行「形勢教育」，「揪軍內一小撮」開始緊急剎車。⁸¹

毛的出手讓林彪感到了日益迫近的危險。的確，以當時林彪惡人做盡的處境，接不了班，就是滅亡。正如一位海外學者揭示林的心態時所說「我為你出生入死打天下，為你把戰友同志得罪光，到頭來你要放我的壞水，叫我孤家寡人，何處落場？」⁸²也就是說，你毛澤東靠文革完成黨內清洗，我林彪靠文革完成軍內奪權，你讓我抬轎，我要你放權，大家各得其所，或許能相安無事，如果你毛澤東只是利用我林彪，而且在讓我成為眾矢之的後，再將我拋出或打倒，那我林彪也不甘坐以待斃。然而，以當時林的力量要跟毛去較量，顯然是小巫見大巫，不自量力的，唯一的辦法仍是「打著紅旗反紅旗」。於是在「大抓軍內一小撮」被緊急剎車後，林一夥開始轉而實施「清君側」的方略，從8月中旬起，重點把攻擊矛頭指向周恩來及其領導下國務院系統各部門。⁸³是月，上海出現了矛頭對準周恩來的所謂「伍豪啟事」大字報，早在是年5月就成立，後沉寂一時的「首都五一六兵團」也空前活躍。⁸⁴8月7日，「七二〇事件」的英雄王力來到北京外語學院，發表了他著名的所謂「王八·七講話」，號召「造外交部的反」、「奪外交部的權！」8月22日，北京發生了火燒英國代辦處的事件。北京出現的大亂形勢，矛頭所向十分清楚，在林的勢力甚囂塵上時，形格勢禁下的周恩來招架不住了，他需要毛的援手。以下是楊成武的一段回憶：

火燒英國代辦處的事件發生後，周恩來聞訊「怒不可遏」。要使形勢得到控制，就要採取一定的措施，而周恩來又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來行動，他決定把北京的有關情況告訴已在上海的毛澤東，請毛澤東定奪。⁸⁵周關於北京情況的材料是讓楊成武送交主席的。在楊把這些材料交毛時，楊看得出毛的「心情似乎不太好」，他對楊說：「知道了，你先回去休息，我看看材料，考慮考慮。」兩天後，楊成武被毛請了去，毛對楊說：「我考慮好了，你回去告訴總理『王、關、戚』破壞文化大革命，不是好人，你單獨當面向總理報告，把他們抓起來，要總理負責處理。」楊記錄了毛的話。臨行前，楊又到毛那裏，問毛還有無別的指示。毛像是想起了甚麼，說：「先抓王力、關鋒，把他們分割一下，看戚本禹有無轉變。」就這樣，結束王、關、戚政治生命的決定在上海的賓館發出了。⁸⁶周在接到毛的指令後，立即在人民大會堂召集會議，王、關被當場拿下，從此消失在文革的政治舞臺。⁸⁷一個月前，王力還是從武漢凱旋歸來的「大英雄」，不到一個月就淪為囚犯，體制內文人，用之則

重，舍之則輕，其命運不是扮奴才，就是充打手，可悲、可歎。⁸⁸不僅如此，毛、周在採取對王、關等人逮捕的措施時，讓楊成武去北戴河向林彪通報也是別具深意的。楊與林的關係，楊的代總長是林彪給的，但那個「代」字也是林彪讓加的，其目的就是要看楊成武能不能成為他的心腹。「七·二〇事件」後，周讓楊成武、余立金陪同主席視察，楊、餘等很快將對林的忠誠變為對主席、總理的緊跟。林是個明白人，對楊等的擇枝而棲已有洞悉。現在，毛、周讓楊去向林通報王、關、戚事件，乃讓楊以現身說法去警告林「要挖我的山頭辦不到」。⁸⁹故在楊到北戴河後，林給他的待遇是「先等著」，兩個多小時後，他才被叫進林彪的居室，勉強握手後，林第一句是：「有甚麼話說吧！」在聽楊彙報了對王、關的處理後，林只是微微點個頭。楊問：「林副主席還有甚麼指示嗎？」「沒有了」林用冷冰冰的三個字結束了談話。從林那裏出來後，楊從裏到外感到一股涼氣。在楊成武記憶中，這是他與林之間一次最為「難堪」的見面。也正因為此，半年後（1968年3月），所謂「楊余傅事件」又發生了，楊成武等也於一夜之間與王、關、戚一樣，成了階下囚。⁹⁰

為給林彪一夥以堅決的震懾和迎頭痛擊，毛、周在重手出拳，拿下王、關的同時，也猛然增大了對所謂「打著紅旗反紅旗」一類「反革命兩面派」的攻擊火力。9月5日，江青接見安徽來京代表，強調「文攻武衛」，稱：「誰要跟我武鬥，我一定要自衛，我一定要還擊！」是日，由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連銜發佈了著名的「九五命令」，嚴格禁止群眾「進駐軍事機關」，「搶奪軍隊武器」，違者將以「國法論罪」。此命令也由江青當著安徽來京群眾組織代表宣讀錄音，分送各地播放。⁹¹6日，北外「紅旗」、郵電學院「井岡山」、經濟學院「紅旗」等十餘個組織攻佔外院「六·一六」總部，抓獲15名「炮打周恩來」的學生領袖，⁹²7日晚8時，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全文廣播姚文元的文章《評陶鑄的兩本書》，文稱：「現在由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採用陶鑄的反革命兩面派手法，所謂『五一六』的組織和操縱者就是這樣一個搞陰謀的反革命集團。」9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通知，要求全國「認真學習江青《九·五講話》」，清查『五一六』分子，各地紛紛成立「文攻武衛」指揮部。9月16日，《紅旗》被抄，次日出版的《紅旗》第14期刊出「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我國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支柱」的社論，開始一反以往「揪軍內一小撮」的氣勢，把解放軍稱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擎天柱」。⁹³9月17日，周恩來、江青接見大專院校代表，並發表重要講話。話中對林彪一夥進行了近乎於點名的批判。如周稱：「『武裝奪取政權』，『戰爭解決問題』，我們一聽，這怎麼像話。奪誰的權，全國軍事大權在毛主席手裏，毛澤東思想掛帥，怎麼能武裝奪取政權」，「這個懷疑一切，懷疑毛主席領導的黨中央，懷疑軍隊，懷疑革命委員會，想幹甚麼好事，很容易走到對立面。去年的革命者可能走到對立面，希望你們不要滑過去，我們和你們共過患難，是戰友。如果硬要滑過去，那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沒辦法。」江青更指出：「這樣做是自毀長城」，還告誡紅衛兵造反派小將：「我建議你們提高革命警惕，注意壞人，你們有些錯誤，是壞人引誘你們犯的。有些壞人以左的面目出現，搞兩面派，我們也有個認識過程，何況你們，所以不能責怪你們。但你們要提高警惕，善於識別。」⁹⁴與此同時，由於「七·二〇事件」的警示，毛開始對文革的戰略步驟作出重大的調整。根據9月24日新華社電，毛自7月份以來，開始巡視華北、中南和華東各地方，調查了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文化大革命的情況，毛的巡視通常具有戰略作用，就在這次為時3個月的巡視中，毛形成了他的文革新方略。毛的新戰略是甚麼呢？10月7日，中共中央將毛視察過程中，對文化大革命發表的一系列意見整理成文，發出了一個通知，內容見下：（節略）⁹⁵

一、關於形勢。7、8、9三個月形勢發展很快，全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整個形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亂，其時都是亂了敵人，鍛煉了群眾。再有幾個月時間，整個形勢將變得更好。⁹⁶

二、關於大聯合。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再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成誓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⁹⁷

三、關於對待幹部。絕大多數幹部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極少數，……要允許幹部反錯誤，允許幹部改正，不要一犯錯誤就打倒。……⁹⁸

四、關於紅衛兵。對紅衛兵要進行教育，加強學習。要告訴革命造反派的頭頭，現在正是他們有可能犯錯誤的時候了。⁹⁹

從以上4點重要指示來看，這時的毛已不熱心於風暴，他需要儘快完成「奪權」任務，儘早結束與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的較量，而後才好「收攤子」，以便騰出手來從容對付林彪。然而，林彪也決不是善罷幹休的，毛的無情還擊，使林感到憤怒。尤其是王、關等的被抓，對林彪來說，猶如斷其臂膀，林完全明白，這是毛給他的一個嚴重警告。但林似乎並沒有太把毛放在眼裏，因為林心裏清楚，毛現在還不到與他「攤牌」的時候，他還有與毛較量的資本，那就是兩樣：一、軍隊，只要有軍權在握，毛就不能輕易把他扳倒；二、文革，只要劉、鄧尚未徹底打倒，毛就需要維持與林的結盟。於是，林彪在毛的連連還擊面前，並沒有輕易示弱，表面上「大抓軍內一小撮」在《九五命令》後開始趨於平靜，但暗中高層軍權的爭鬥則較前更為激烈，1967年底開始北京刮起「倒謝（富治）妖風」，以及次年3月突然發生的「楊、余、傅事件」，都是這一時期林彪對毛的回敬。¹⁰⁰林並很快又發明了「反三右」的口號（「反右傾翻案、反右傾分裂、反右傾投降」），一方面繼續用「兩面派」的手法來聲東擊西，混淆視線，一方面開始關注於各地的「奪權」鬥爭，借文革「支左」中軍人權力的無限擴張，通過各地革委會成立中的「權力再分配」，實現林派勢力在各大軍區和地方的更大伸展。然而，這時的毛，對林已高度警惕，豈能再讓林彪得手，於是採取「以其人之道還制其人之手」的策略，重用軍隊中的非林譜系人馬對林實行牽制，同時牢牢把住各地革委會成立中的「權柄關」，與林派人馬展開了激烈的權力爭奪戰和拉鋸戰，於是乃爾，自進入1968年後，各地武鬥更進入白熱化，¹⁰¹此也乃毛所指盼的「全國山河一片紅」遲遲不能實現的原因。

然而，這時的毛、林之間雖已出現巨大裂縫，但在報章刊物上，偉大統帥和他親密戰友形影不分，宣傳一仍以往，林彪、江青、葉群等互相吹捧的頻率反而異乎尋常地高漲了起來，尤其在「中央首長」一起出現的公開場合中。1968年3月，「楊、余、傅」事件發生，在宣佈楊、余、傅罪狀的軍隊各兵種1萬餘人大會上，每位出席「中央首長」講話，都不時有人插入大呼口號，喊的次數之多，令人眼花繚亂。林彪講話時，江青帶頭領呼「向解放軍學習！向解放軍致敬！」江青講話時，也每每有葉群高喊「向江青同志學習！」「向江青同志致敬！」周恩來的口號則是「誰反對江青同志就打倒誰！」於是乎，會場上口號此起彼伏，喊成一片。¹⁰²喊口號，乃玩政治人的即興表演，然文革中中國政壇「領袖人物」口是心非的做「政治秀」到如此肉麻的地步，讓人不得不佩服「政治人物」一個個的寡廉鮮恥。也就在這次大會上，周恩來當眾宣佈了由黃永勝接替楊成武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溫玉成為北京衛戍區司令的命令。¹⁰³這一任命從長遠看，是毛玩了一個名升暗降、調虎離山的把

戲。但在當時看，無疑是毛向林作出的重大讓步。之所以如此，乃毛心裏明白，他與林還不到分手的時候。1968年，毛的文革「奪權」鬥爭進入最後階段，而持續了一年多的「拉鋸戰」使毛意識到若不與林妥協，實現「全國山河一片紅」的目標就將遙遙無期，而一旦與林彪分道揚鑣，毛的文革部署，輕則半途夭折、中挫，或根本無法繼續。重則導致真正的天下大亂，毛完全失去對文革的控制。顯然，毛已把自己逼到了懸崖上，他必須在兩堵懸崖間走鋼絲，要想不粉身碎骨，就必得靠上一處絕壁，何去何從？毛確實不愧為最大的政治賭家，在毛與劉已成為不共戴天的仇敵後，毛似乎已無選擇，他寧可「與狼共舞」，也不願意看到讓劉派勢力的東山再起。於是他容忍了林的造次。從毛踏入政治舞臺以後的歷史看，毛從來沒有向任何人無條件的投降，無保留的妥協，而當他後退時，他也總是做好了再次進攻的準備。1927年對瞿秋白、李立三是如此，1931年到1934年對王明、秦邦憲也如此，抗戰時與國民黨的聯合是如此，文革前對劉少奇、鄧小平也如此。這次與林的鬥爭當然也不例外。毛為了實現他的戰略目標，他需要，也必須做出一定讓步，以緩解與林的矛盾，換取林對他召開八屆十二中全會徹底打倒劉少奇的支持。當然，在林實際握有這樣軍權的情形下，毛已不想讓林的勢力繼續發展，他在維持與林「親密戰友」的同時，做的是與林作最後較量的準備。

註釋

- 1 中共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部教授韓鋼〈中國現代史研究的若干難點、熱點問題〉，第36頁，載中國現代史學會《通訊》，第10期，2006年1月14日。
- 2 1962年七千人大會被認為是毛發動文革意圖的肇始，在這次會上，毛因大躍進失敗的錯誤，受到劉少奇、彭真等人含蓄的批評。正式林彪站出來袒護毛的錯誤，說「這些困難在某些方面，某種程度上，恰恰是我們沒有照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對林的講話，毛相當欣賞。
- 3 林彪〈5·18講話〉（1966）中把毛吹成「全國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偉大的人物」。林並說：「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廣泛應用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在當代世界上沒有第二個人。十九世紀的天才是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紀的天才是列寧和毛澤東。」捧毛捧到肉麻的程度。
- 4 1965年底，文革開始前夕，羅瑞卿在無任何跡象的情況下被逮捕整肅，其主要罪名就是「反對林彪」，「逼迫林彪同志『讓賢』、『讓權』」。（見《中共中央工作小組「關於羅瑞卿的錯誤問題」的報告》，1965年12月8日。）在毛幫林拔去了「眼中釘」後，作為回報，林彪於1966年2月委託江青召開了召開部隊文藝座談會。此間交易，如江青所說「去年二月，林彪同志委託我這個文藝座談會的紀要，是請了你們『尊神』，無產階級專政的『尊神』來攻他們，攻那些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那些資產階級反動『權威』，才嚇得他們屁滾尿流，繳了械。」（〈江青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7.04.12）
- 5 這封信的真偽，現在研究者中是有爭議的，因為據說此信正件當時已銷毀，林彪事件後才公開的這封信是江青、康生重新寫的。本人認為，即便該信有部分內容是後加上去的，但仍有相當可信性。
- 6 《徐景賢回憶錄》，第8頁，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1月版。
- 7 1967年《人民日報》元旦社論稱「1967年，將是無產階級聯合其他革命群眾，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的一年。」
- 8 〈毛澤東對南京軍區黨委關於是否派軍隊支持造反派請示報告的批示〉，1967年1月21日。
- 9 〈毛、周等接見軍委碰頭會人員講話〉，見香港中文大學史料研究中心《中國文化大革命史料光碟》
- 10 最早的檔為1966年5月頒發的〈關於執行中央5月16日通知的通知〉，規定部隊文化大革命運

動，限制在宣傳、文化、報刊、出版、院校、科研部門。6月14日，全軍文革小組又頒發了關於部隊開展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十條規定》。10月29日，時為全軍文革小組組長的劉志堅（總政治部主任）在各軍區政委和文革組長會議上作報告，規定軍區司令部、政治部、後勤部等領導機關，不得進行串聯活動。

- 11 林彪軍隊譜系：井岡山時期的紅一軍團—抗戰時期的115師—解放戰爭時期的第四野戰軍。文革前，林為加強自己對軍隊的控制，極為重視幹部的「政治血統」。在握掌重要軍權的崗位上，都儘量安排林彪系統的幹部，即所謂四野譜系的人物。文革中，更是登峰造極。軍隊高層，如軍委、總參、總後、總政（曾一度取消），以及各大兵種核心部門的領導多半為四野出身。詳見「1967年底軍委總參謀部主要負責人出身列表」，轉載自《中央文革運動中的組織與人事問題》，第160頁。
- 12 在地方10個大軍區中，文革之前，屬四野譜系擔任司令員和專職政委者，僅廣州軍區的黃永勝（司令員）、福州軍區的韓先楚（司令員）、南京軍區的杜平（政委）、濟南軍區的袁升平（政委）4位。而最有實力的幾個大軍區主要領導則多半不屬四野譜系，如北京軍區的楊勇、南京軍區的許世友、瀋陽軍區的陳錫聯、成都軍區的黃新廷、昆明軍區的秦基偉、武漢軍區的陳再道等。
- 13 1967年3月底、4月初，也就在「文革派」加大火力痛擊「二月逆流」時（批葉劍英、陳毅、徐向前），國內很多軍區幾乎於同時舉行了武裝遊行示威以示抗議。
- 14 林彪曾說過：「我這個接班人是保險的，不可靠的，現在是沒有人，劉少奇不也當過接班人嗎？」見《回首文革》（下），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992頁。
- 15 毛對文革中所流行的「毛主席親自締造的，林副主席親自指揮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說法尤為反感，曾氣憤地責問「締造的就不能指揮嗎？」
- 16 「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是軍隊中以軍事院校學生為主體的造反組織。文革開始後，軍隊的文革被限制在軍事院校、文化團體和某些軍事科研單位，所以有所謂「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組織的產生，這部分軍隊造反派是最早被林彪用來衝垮軍中異己勢力的工具。而所謂「二月逆流」，則是黨內一些原來對毛搞文革雖不太理解，但仍願意跟毛「繼續革命」的黨、政、軍內一批高層領導們，對文革以及中央文革的不滿的總爆發。1967年2月14日下午，周恩來在中南海懷仁堂主持召集當時負責日常工作的黨政軍有關領導和文革小組成員的碰頭會。會上中央軍委和國務院領導人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以及餘秋裏、穀牧為一方，以康生、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等中央文革成員為另一方，展開了短兵相接的鬥爭。懷仁堂發生的這一事件立即被彙報給了毛，招致毛龍顏大怒，聲稱「要上井岡山打遊擊」。於是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組一應人乘機向「三老四帥」下手，把這場交鋒說成是「推翻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決議，替已經被打倒的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翻案，把矛頭對著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而後便展開了所謂反擊「二月逆流」的鬥爭，其結果是把當時屬於中共最高領導層的許多黨政軍領導人擺放在岌岌可危的位置上，自此以後，萬馬齊喑，不再有人敢站出來為劉少奇說公道話了。
- 17 反擊「二月逆流」以後，從2月25日，到3月18日，毛在懷仁堂召開了7次「政治生活會」，會上林彪和中央文革派展開了對為首「老師」的批鬥。與此同時，林彪也加緊了對「自家班底」的營造和拼湊。林的親信多半產生在他的四野譜系中，核心人物用的更是「雙一」標準，即（紅一軍團、紅一方面軍）。為了讓他所看中的人能夠死心塌地地忠於他本人，他在物色時就採取了又打又拉的手段，所謂「恩威並重」，即先讓他們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在陷入困厄時由林或葉群出面來干預或搭救，如這一時期被林彪收為己用，並在以後成為林彪股肱的空軍司令吳法憲、海軍司令李作鵬、總後部長邱會作、以及先為廣州軍區司令員，後被擢升為總參謀長的黃永勝等，都有這樣的經歷。而這些人在被林「搭救」，並受重用後，對林彪自然感恩戴德，無限效忠。吳法憲曾在林彪面前流著淚呼喊祝林彪「萬壽無疆」，李作鵬則說：「林副主席活著跟他幹，生與林副主席同生，死與林副主席同死。」邱會作說：「林副主席、葉主任是再生父母。」還專門寫了篇《零點得救》的文章，以表對林彪救命之恩的感念。
- 18 此種策略，也即林彪後來所說的「要師出有名，要有行動的藉口。挑起幾個大事件，逼迫軍區領導犯錯誤。」見1968年9月1日廣州《三軍聯委戰報》。

- 19 如上已述，文革進入「奪權」階段後，在各地時受到原當權派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抵制，為此才有毛派軍隊「支左」的決策。然而，軍隊介入地方文革後，能否就會站在「左派」（也即當時由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一邊，實在是殊成問題的。僅從感情上來說，由於中共軍方領導與地方「當權派」在「打江山」年代就曾是一個戰壕裏的戰友，雖然此後部分在地方工作，部分留在軍隊，但彼此間關係密切，對他們被造反派胡亂批鬥，往往報以同情。此外，在兩派群眾組織出現嚴重對立的地方，被視為「造反」組織的一方，往往內部成分複雜，在軍隊領導看來，此類組織多半有「壞分子」混雜其間，而被「造反派」罵為「老保組織」的一方，其成員則多為「紅五類」，熱愛黨，熱愛老幹部，如果要軍隊自己決定支持哪一方的話，毫無疑問，多數軍隊支持的不會是前者，而只會是後者。更重要的是，奉命「支左」的部隊多屬大軍區領導，而大軍區主要領導中有很多為非林譜系，而林彪為控制軍隊起見，認為掌握軍隊的大權的人只能在林彪系統中產生，這些非「四野譜系」軍人是不可相信的。尤其是反「二月逆流」後，由於軍中不少老帥挨整，使得下面軍隊中很多與這些「老帥」有歷史關係的非林系統的高級將領人人自危，害怕哪一天也整到自己頭上，故而在奉命「支左」中，對造反派戒心森嚴，對被打倒的地方幹部則抱有同情，因而在軍隊奉命「支左」的很多地方，軍隊不僅未能去支持造反派，反而出現了普遍的「支右不支左」現象。而這一現象的出現，恰好為林提供了搞垮這些大軍區領導人的藉口。（1968年9月1日廣州《三軍聯委戰報》）
- 20 關於1967年上半年的各地武鬥和衝突事件，可見這一時期各地紅衛兵和造反組織所辦的小報，以及「中央首長接見各地造反派進京代表的講話」。
- 21 在林彪需要借毛澤東的「文革之手」，向軍中異己勢力發起攻擊時，當時得到中央文革直接支持的首都幾大造反組織便成了他可供利用的工具，林彪需要用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造反小將再次來為他「揪軍內一小撮」戰役打頭陣。而這些造反組織的頭頭，也因為前一階段所向披靡的造反成果，已成為這一時期的政治明星，個個頭腦發昏，既然軍隊中有人敢冒大不韙「支右不支左」，那他們就敢向這些「帶槍的劉、鄧」發起衝鋒，尤其是這一資訊來自「無產階級司令部」裏的某些人後，更加有恃無恐，當仁不讓，衝殺在前。於是，在1967初起的「揪軍內一小撮」之風中，原來毛打倒劉、鄧所依靠的造反派組織，幾乎全成了「揪軍內一小撮」的幹將，蒯大富手下的清華井岡山兵團、韓愛晶北航紅旗、聶元梓的新北大公社等，更是一馬當先，但凡發生大軍區與造反派組織對立的地方，幾乎都有他們的身影，從而也為這些風雲人物在半年後即迅速在革命舞臺上消失，並變為階下囚作了不自覺的鋪墊。
- 22 林把毛尊奉為「活著的愷撒」，視自己為「中國的克倫威爾」，而他領導下的中國的解放軍則應該成為「1860年倫敦那種單純、心明眼亮的『新模範軍』的亞洲版」，見（美）羅斯·特里爾著《毛澤東傳》第376頁。
- 23 林彪在1967年上半年製造「打倒拿槍的劉、鄧」輿論，煽動「揪軍內一小撮」時，充分利用了江青的狂妄和無知。也就是說，林彪想打倒誰，自己通常並不出面，而是處處突出江青，把江青捧得的暈暈糊糊，讓她出面到處發表支持造反派的講話，去與那些犯了「支右不支左」錯誤的大軍區領導針鋒相對。比如武漢發生動用軍隊抓捕「造反派」事件後，逃到北京的造反派在人民大會堂受到江青接見。又比如1月29日四川發生造反派圍攻成都軍區事件，葉劍英以軍委名義發出「2·17通知」制止，江青氣得將通知焚毀。這當然正中林彪下懷。林通過這樣的手段，既打擊了自己的對手，又讓軍隊高級幹部將怨恨集矢于江，除此而外，還通過江青的情緒影響了毛，可謂一石三鳥。嗣後因毛、林矛盾發展，江青也意識到自己上了當，恨恨地說：「現在不能這樣再上別人的當，到處揪軍內一小撮。我就給北京的小將談過這個問題，去年點革命之火，那是大串聯囉！現在又出去了，那就是幫倒忙了。……上了別人的當」。見1967年9月5日〈江青對安徽來京代表的講話〉。
- 24 在1月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佈《關於中國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中，就明確規定：（1）以前關於軍隊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違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廢；（2）積極支持廣大革命左派的奪權鬥爭，凡是真正的無產階級左派要求軍隊去援助他們，軍隊都應該派出部隊積極支持他們；（3）堅決鎮壓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組織，如果他們動武，軍隊應該堅決回擊；（4）軍隊不得做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防空洞；（5）要在全軍深入進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以劉少奇、鄧小平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鬥爭的教育。

- 25 日本《讀賣新聞》，1967年4月4日。
- 26 關於毛這一時期為收攬軍心而採取的步驟最明顯地可見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要為人民立新功〉。江在這個談話中大講毛為人如何好，說「主席總是說甚麼人有大功哪！這個人怎麼好啦！不怎麼說人家壞話的。主席對幹部愛護、寬大。」同時為消除軍隊中不少人對她的反感，一再替自己表白，說自己「對於中國人民解放軍很有感情」，尤其是「老紅軍」的敬仰，還故做矯情地談起延安時期的一段往事，說：「我向來是非常敬仰老紅軍的。……曾經有人給我的帽子上做了一顆紅星，後來說是不許戴，我才戴了幾天就不許戴，為這個可鬧彆扭啦！」對於前階段支左中，很多軍隊並不支持左派，江青擺出諒解的姿態，但強調的重心不再是「支持造反派」，而是軍隊「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要「真正站到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方面來」。因在座將軍中為數不少人的孩子因「聯動」問題至今仍被關押在牢，江青為消除他們的反感，講了一個「觸蜚見趙太后」的典故，用意顯然是希望能得到這些將軍們諒解。講話後幾天，被關押的「聯動分子」在江青阿姨的親自過問下被釋放。
- 27 五大軍區中，除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外，瀋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南京軍區司令員、福州、濟南軍區如許世友、韓先楚、楊得志等。
- 28 在1967年1—6月間，在大軍區所在的福州、廣州、成都、西藏、武漢、南京等地，都發生了的造反組織衝擊大軍區的事件，各地武鬥也愈演愈烈，並且出現了軍隊與軍隊之間的對抗。尤其是4月份以後，各地武鬥已發展到內戰規模。這一情形在時任公安部長兼北京市革委會主任謝富治1967年5月14日講話中就有，謝在講話中談到：北京從4月30日到5月10日，武鬥出動人數達63,500多，其中發生50人以上參加的武鬥133次。重慶武鬥從6月4日到8日，（軍區支持「八一兵團」襲擊、圍攻西南師大「八一三」造反派，發生武鬥），參加人數達2萬多，死百餘，傷千餘，軍隊甚至使用了大炮200門，步槍上萬支，杭州5月29日發生大規模武鬥，6人被槍殺，150人受傷（軍隊支持浙江產業軍襲擊造反派）。各地武鬥情形，見其實各類造反組織自辦刊物。
- 29 毛是以準備「橫渡長江」為名去武漢的，但正如王力在他的《回憶錄》中所說的：「主席去武漢並不是真的為了游泳，而是要就地解決問題。」見董保存著《知情者說》，第三輯之八，中國青年出版社2004年1月版。
- 30 「七·二〇事件」後，林彪有個〈八·九講話〉，裏面就講到：過去有三個大軍區不聽話，北京、武漢、成都，他沒有辦法，陳再道就是不聽話，所以林說：「這回可找到做文章的題目了。」
- 31 見董保存著《知情者說》，第三輯之八，中國青年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75—76頁。
- 32 全軍文革小組成立於1966年〈五一六通知〉下達後的6、7月間，最初統屬於總政領導，第一任組長為時任總政副主任的劉志堅，他同時也是中央文革小組的副組長。在劉主持全軍文革小組期間，軍隊還沒有直接介入地方文革。1966年12月，劉志堅因未完全按中央文革派意圖辦事，被說成「執行了劉、鄧資反路線」而打倒。1967年1月11日，全軍文革小組改組，改組後全軍文革小組不再屬總政領導，而直屬於中央軍委和中央文革小組。新的全軍文革小組由徐向前任組長，成員有20多人，表面一看似乎山頭主義色彩不濃，但仔細一考，可發現其中與徐向前發生過較長部屬關係者，人數比較多一些。他們是謝富治、王新亭、徐立清、王宏昆、唐平鑄等。毛澤東突然重用閒置已久的徐向前，並且吸收較多的徐的舊部屬加入全軍文革小組，顯然是有用心的。用心之一，是因為文革中打倒了一些老師，屬於賀龍、彭德懷等系統的幹部顯然已不被信任。而「紅四方面軍-129師」幹部（在解放戰爭時期多編入「二野」），因在軍隊中擔任相當職務的人不少，也有較大影響力，毛想通過起用的手法，達到「團結大多數」以孤立彭、賀系統軍事幹部的目的；用心之二則明顯是牽制林彪勢力的，用「二野」抗「四野」，是毛的權力制衡術在軍隊中運用與反映。
- 33 工總：全稱「毛澤東思想戰鬥隊武漢地區工人總部」。是武漢地區最早成立的造反派工人組織。
- 34 陳再道在1967年2月26日到3月25日北京召開的軍以上幹部會議上的話，見王年一《史無前例的年代》，第404頁。

- 35 照說密商奪權無異於謀叛，一旦敗露，留下錄音，無疑是給自己留下的罪證，李希迎作為軍區主要領導之一，當然知道其中的利害關係。之所以這麼做，顯然另有需要。
- 36 1968年7月廣州「工革聯」主編《資料專輯》中「李希迎的罪狀」。
- 37 日本《朝日新聞》1967年7月21日北京電：這一時期武漢文革情況還可參閱《戚本禹王力接見湖北代表座談紀要》（1967.05.15）
- 38 《陳再道回憶錄》，第39—40頁。
- 39 王力、關鋒、戚本禹、林傑、穆欣，握掌《紅旗》雜誌、《解放軍報》大權，為林彪集團的主要筆桿子，也是「揪軍內一小撮」輿論的主要製造者，1967年前後，先後被撤職，投入監獄。
- 40 見〈「七·二〇事件」當事者說〉，第85頁，董保存著《知情者說》，第三輯之八，第77頁。
- 41 見王力〈對陳再道《武漢七·二〇事件始末》幾個問題的說明〉，載《王力反思錄》上冊，第249—250頁。
- 42 見《王力反思錄》（下），第1005頁。
- 43 見〈「七·二〇事件」當事者說〉，第80頁，董保存著《知情者說》，第三輯之八，第77頁。
- 44 這並不是筆者的臆測，後來的一系列發生的事證實了這一點。
- 45 〈「七·二〇事件」當事者說〉，第85頁，載董保存著《知情者說》，第三輯之八。
- 46 見〈「七·二〇事件」當事者說〉，第85頁。
- 47 〈「七·二〇事件」當事者說〉，第85頁，董保存著《知情者說》，第三輯之八，第85頁。
- 48 〈「七·二〇事件」當事者說〉，第85頁。陳再道說：「王力講完後，謝富治又要劉豐等空軍負責人挨個『亮相』」董保存著《知情者說》，第三輯之八，第85頁。
- 49 《王力反思錄》（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1007頁。
- 50 〈王力同志在武漢鋼二司紅水院歡迎會上的講話〉（1967年7月19日），見《王力反思錄》（上），第254—257頁。
- 51 陳再道文中說：「王力講完後，謝富治又要劉豐等空軍負責人挨個『亮相』」見董保存著《知情者說》，第三輯之八，第85頁。
- 52 董保存著《知情者說》，第三輯之八，第88頁。
- 53 董保存著《知情者說》，第三輯之八，第91頁。
- 54 至於事件發生時，作為當事人的陳再道、王力等，是否就能意識到自己捲入了毛、林矛盾中，筆者認為答案恐怕也是否定的。他們雖然也是接近權力核心圈中的人物，但毛、林矛盾從隱蔽到公開，到激化有一個過程。所以，當事人的捲入，很可能不是自覺的，而是無意識的，很大程度上是受各自在文革中立場和傾向性的驅動。但是在事件過程中發展過程中，作為「個中人」的他們一定會有察覺，開始自覺地、有意識地依附和投靠，但不論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也好，「上賊船」也好，「天機」都不能道破，否則該當何罪，這些在中國政治圈中摸爬滾打多年的人都是心知肚明的。而事後以至今日，他們仍然對事件真相諱莫如深，刻意加以回避，則更多可能是由於「為尊者諱」的緣故。
- 55 此幾位與王力一樣都是中央文革小組中得到林彪重用的主要筆桿子，「揪軍內一小撮」輿論的主要製造和鼓吹者。陳伯達時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戚本禹、關鋒分別為《紅旗》雜誌、《解放軍報》主編。
- 56 據說是余立金的8199部隊和空降獨立師。
- 57 見《陳再道回憶錄》，第66頁。
- 58 〈「七·二〇事件」當事者說〉，第102頁，載董保存著《知情者說》，第三輯之八。
- 59 〈「七·二〇事件」當事者說〉，第102頁，載董保存著《知情者說》，第三輯之八。

- 60 〈「七·二〇事件」當事者說〉，第100-101頁，載董保存著《知情者說》，第三輯之八。
- 61 另據8月11日日本《讀賣新聞》北京電訊報導：武漢兵變幾天中，被王力指為「叛徒徐向前一派」的許世友所指揮的南京部隊、福州軍區司令指揮的福建和江西也出現緊張局勢，不少地區武鬥加劇。北京電報局曾一度停止受理一切新聞電報，封鎖消息。
- 62 毛當然不相信林彪的所謂「兵諫」、甚麼「謀害主席」、甚麼「反革命事變」等，毛自己的結論是「不過是要王力作為人質。迫使中央改變處理武漢問題的方針」。因為毛心裏很清楚，他自己就是這出戲幕後真正的導演。事實上，毛在事變當日就曾與陳再道見過面，並指示「放王力」，但不能講出是「毛的指示」。見〈「七·二〇事件」當事者說〉，第90頁，載董保存著《知情者說》，第三輯之八。
- 63 〈「七·二〇事件」當事者說〉，第92頁，載董保存著《知情者說》，第三輯之八。
- 64 總理到武漢後，知道王力失蹤很著急，下令找到王力。而其時，王力已由劉豐從接出，轉移到了空軍司令部保護了起來。
- 65 《陳再道回憶錄》，第66頁。
- 66 被要求一起到北京的除陳、鐘外，還有牛懷龍（29師師長）、蔡炳臣（獨立師政委）、巴方廷（武漢市人武部政委）等5人。
- 67 會上情景可參見王年一《史無前例的年代》，第428-429頁。
- 68 《王力反思錄》下，第1066頁。
- 69 由於文革中，林彪得毛重用，親信股弘遍佈各軍、各部，除掌握槍桿子外，毛若加以清除，勢必激起兵變，而若不加清洗，任其繼續坐大，則更屬後患無窮，毛處在進退維谷之中。因此，查閱毛這一階段（1967年8、9月間）在公開場合的講話，可看到毛多次黯然地提到「群眾被蒙蔽的問題」。9月在接見阿爾巴尼亞代表團時，則稱自己對「放棄對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當權派的鬥爭的傾向感到憂慮。」從毛的這些話中，可看出其時局勢對毛是很不利，文革以來，毛從未說過這麼沉重、軟弱和黯淡的話。兩年後，毛在九屆一中全會上說了實話，稱「前年（指1967）我們在上海那個時候可不得了了，七、八、九三個月，現在日子總好過一點嘛！」（1969年4月28日）
- 70 毛的底線：保持住文革路線仍在高歌猛進的「大好形勢」，穩住文革搭起的架子，不能讓毛堅持要打倒的人翻案，如果這三條不能保住，毛的文革不僅無法再向前推進，而且會出現崩潰的連鎖反應。所以毛在權衡再三後，不得不與林妥協。
- 71 如在對陳再道的處理，毛在批復中央給武漢軍區黨委檔上，在陳再道名字後面，加上了「同志」兩字，嗣後陳再道、鐘漢華都被留京進了「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實際上是被保護了起來。與此同時，毛開始到處「打招呼」，散佈不滿和不利於林的輿論。據跟毛一起出巡的楊成武回憶（見董保存著《知情者說》，第三輯之八，第132-134頁。）：此一期間，毛開始不斷地發表「精闢見解」，如針對林彪的「四個偉大」，毛問「誰封我四個官啊？」又如「甚麼永遠健康，難道還有不死的人嗎？」……等等，而在召見各地區的高級軍事人員時，也經常用「那位副統帥」，而不用「同志」來稱呼林。
- 72 「七·二〇事件」後，武漢「鋼二司」及廣州造反派珠影東方紅合刊文章《武漢「七月革命」》一文：7月22日，武漢造反派就獲知「陳再道是有後臺的，可能很大，而且問題不僅是武漢。」此則並非空穴來風的消息證明，中共上層鬥爭的內幕當時在造反組織中都已風聞，更遑論個中人的林彪了。另據文革期間給林彪當秘書的張雲生回憶「林彪在1967年之夏的表現前後判若兩人，……過了八一，他又恢復少言寡語，悶悶不樂的狀態。」（見張雲生、張叢《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中華兒女出版社2003年版。）顯然，林彪其時已發現自己可能中了毛的圈套，操之過激，有點覆水難收了。
- 73 這時的林出路應該說有兩個：一、前功盡棄，認輸投降，死心塌地當毛的順臣；二、重整旗鼓，抗爭到底，以求絕處逢生。林顯然選擇了第二條路。因為在林看來，所謂的第一條路對他林彪也許根本不存在，王明、張國濤、彭德懷，以至文革中倒臺的劉、鄧，前車可鑒，而他林彪認輸的下場，只會得到比他們更嚴酷的處置。

- 74 徐離開前，寫了張條子給總理，內容不詳。見〈「七·二〇事件」當事者說〉，第109頁，載董保存著《知情者說》，第三輯之八。
- 75 其時的總政治部主任為肖華，肖華本來是屬於林彪看重的人。「二月逆流」事件出來以後，徐向前請假檢討，全軍文革小組工作實際由肖華負責。但要軍隊要不要開展「四大」，以及在要不要「揪軍內一小撮」問題上，肖華的態度令林彪、葉群失望，從而失去了林的信任。武漢事件後，在「揪軍內一小撮」狂潮中，總政被砸爛，肖華下臺。
- 76 《「七·二〇事件」當事者說》，第107頁，載董保存著《知情者說》，第三輯之八。
- 77 1967初起的「揪軍內一小撮」之風中，原來毛打倒劉、鄧所依靠的造反派組織，幾乎全成了「揪軍內一小撮」的幹將，蒯大富手下的清華井岡山兵團、韓愛晶北航紅旗、聶元梓的北大，更是一馬當先，再次成為各地「揪軍內一小撮」的急先鋒。
- 78 全軍文革小組最初統屬於解放軍總政，第一任組長為劉志堅。1967年1月，劉志堅被打倒，全軍文革小組重組，組長由徐向前擔任，接受中央軍委和中央文革小組的直接領導。武漢事件後，全軍文革小組再次改組，直到1968年3月「楊、余、傅事件」後，全軍文革小組被軍委會核心組所代替。成員為吳法憲、邱會作、張秀川、葉群。見周恩來1967年9月17日接見北京大專院校部分代表的講話：「鑒於徐向前、肖華主持的全軍文革小組已經癱瘓，不能領導全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樣決定命吳法憲、邱會作、張秀川、葉群4人組成領導小組，領導全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 79 「七·二〇事件」後，林一方是竭力要通過「揪軍內一小撮」搞掉軍隊中的非林派將領，而毛則欲通過在地方大軍區中依靠非林系主要將領清除林派人物。林一方散佈「武裝革命」、「戰爭解決問題」，毛一方則有「地方包圍中央」的提法。兩不相讓，針鋒相對。不好站出來公開較量，於是都採取了在幕後操縱群眾組織的手法，毛都曾作最壞情勢打算，那就是秘密武裝群眾，建立「第二武裝」。據《王力反思錄》敘述（第1012頁）：1967年8月4日，毛給江青一信，提出「要武裝左派」，好像部隊不可靠了。9月5日，江青在給安徽赴京代表的講話中公開發號召「文攻武衛」，張春橋、姚文元於是支持王洪文在上海籌建上海「文攻武衛指揮隊」。而善於「打著紅旗反紅旗」林彪則乾脆接過毛的話，指示「武裝左派，直接發槍給群眾」。（見〈1967年8月9日林彪接見曾思玉、劉豐時的講話〉，《澤東傳》，第401頁。）自此而後，各地武鬥於是有增無減，從對立兩派群眾組織的惡鬥，發展到軍隊與軍隊之間的對壘和混戰。
- 80 見《文革大年表》，第212頁。
- 81 見《文革大年表》，第211頁。
- 82 朱學淵《一堆糊塗蟲說林彪》，香港《開放雜誌》2004年9月6日。
- 83 國務院是周的領地，由於周恩來在「七·二〇事件」中的角色，林彪已把周恩來視為眼中釘，必欲除之而後快，於是開始對毛實施「清君側」，把攻擊矛頭指向周恩來，包括張春橋。此外，林這一時期對付毛的手段是把局面搞亂，越亂越好，亂了才好混水摸魚。林彪說「亂有四種情況：一、好人鬥壞人；二、壞人鬥壞人；三、壞人鬥好人；四、好人鬥好人。」見1967年《林彪八九講話》。
- 84 最初是北京地區一個「炮轟周恩來」的造反組織，1967年「王、關、戚事件」時即被取締，頭頭被抓。而在文革嗣後階段，「五一六兵團」成了「莫須有」的代名辭。
- 85 見〈代總長與國防部長〉，載董保存著《知情者說》，第三輯之八，第135頁。
- 86 〈代總長與國防部長〉，載董保存著《知情者說》，第三輯之八，第136頁。
- 87 毛的侄女王海容曾就「王力、關鋒倒臺」一事問過毛，毛澤東當時說了二句唐詩：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見陳益南《讀〈外交部文革紀實〉》林彪網站
- 88 在毛、林這些政治人物看來，所謂「筆桿子」，都只有可供利用和驅策的價值，1967年8月中旬以後，「揪軍內一小撮」口號被作為一項錯誤遭批判，而王力、關鋒被抓，使這項錯誤有了「替罪羊」。林一夥在毛髮起反擊後，為掩護退卻，把「大抓軍內一小撮」說成是王力、關鋒私自搞的，把責任推倒了王力、關鋒等「筆桿子」身上，於是江青宣佈「把王力、關鋒逐出中央文革」。與王力、關鋒幾乎同時被拿下的，還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趙易亞（8月23日），他是

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解放軍報》副總編輯。穆欣（9月1日），也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紅旗》雜誌副總編輯。這些文革以來專門製造冤假錯案的刀筆大吏，不幸也都被「莫須有」的罪名所誣，被投進了「中國的巴士底獄」—秦城。其實，這些「秀才」，包括遲3個月倒臺的戚本禹在內，下臺的直接原因無他，乃策劃、參與了「揪軍內一小撮」，本想再立功，不料馬失前蹄，跟錯了人，立馬翻船。中央文革小組在1966年5月16日成立時，連顧問一共有21個成員，經幾次清算，到了1967年9月，隨著王、關、林、穆等被撤職，僅剩下7個人。

- 89 毛嗣後在與林彪相爭中一再講到：我就不信紅一軍團的人會聽你的（指林彪）！」
- 90 1968年3月22日，楊成武因所謂的「楊余傅事件」被捕入獄，成了毛、林鬥爭中最大的犧牲品。
- 91 《江青、康生接見安徽雙方代表團的指示》1967年9月5日。同日，周恩來在接見福建革造會聯絡站負責人時也講到「武漢出了個陳再道，全國就到處揪陳再道，這是對我們偉大軍隊的污蔑！……你們要顧全大局不要動搖軍隊，不要自毀長城，現在已經到了不能容忍的時候了，今天毛主席批發了九五命令說今後再奪槍就是反革命行動了。」此兩講話全文均見香港中文大學史料研究中心編纂《文化大革命史料光碟》。
- 92 9月1日，北京市革委會舉行擴大會議，周恩來、陳伯達、江青、張春橋到會講話，稱：「『五一六』實一個反革命組織。到處打倒周總理，這時從內部搗毀毛主席的司令部，對於這一小撮頭頭，要堅決鎮壓。」
- 93 即便如此，11月23日，《紅旗》在出了第16期後，還是被下令停刊，直到1968年6月才復刊。《紅旗》是中共中央的最高理論刊物，一貫被視為黨的喉舌，但該雜誌實際操縱在林派人物手裏，這一時期被清算的王、關、戚、穆欣、林傑等權勢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在前都擔任《紅旗》雜誌副總編職務，總編是陳伯達。它的停刊，反映了問題的嚴重，和上層鬥爭的激烈。
- 94 《1967年9月7日周恩來、江青等在接見北京大專院校代表時的講話》，見文革史料光碟。在這一時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康生等人一系列公開講話中，雖然對林一夥都以「劉少奇一類騙子」的稱法出現，也即以劉少奇為明靶，但顯然話中有話，明罵劉少奇集團，暗指林彪團夥，影射林彪團夥也是「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反革命兩面派」。
- 95 《通知》全文見陳明顯《晚年毛澤東》，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3月版，第499—500頁。
- 96 毛關於「形勢大好」的強調，公開見報是在是年11月7日的《解放軍報》社論「要抓好形勢教育」中，由於當時反覆進行的「形勢教育」，此段「毛語錄」很快變為文革中談形勢時的套話。然而，在人妖顛倒的文革中，經驗已告訴老百姓，對文革兩報一刊社論中講的話，很多地方是需要反著聽的，說形勢大好，乃形勢大壞，越是強調「大好」，就說明出的問題越大，以致需要悉心加以掩飾，而欲加掩飾的重點，恰恰是形勢不好。
- 97 10月17日，毛對各單位如何進行大聯合又做詳細批示，他說：「各工廠、各學校、各部門、各企業單位，都必須在革命的原則下，按照系統，按照行業，按照班級，實現革命的大聯合，以利於促進革命三結合的建立，以利大批判和各單位鬥批改的進行，以利於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見《人民日報》1967年10月18日。
- 98 毛已在悄悄地佈陣。措施之一就是要大開開門讓當權派幹部過關，為被錯鬥的軍人、安撫、平反，並加以重用，以重新收攬人心。
- 99 毛在這一期間屢次對紅衛兵提出批評，表示他不同意紅衛兵的過火行動，這樣做，一方面是要讓被沖被鬥的幹部出口氣，一方面也在為轉變策略搭臺階。此外，從1967年下半年起，毛提出「複課鬧革命」號召，要造反派和紅衛兵小將不要再在外頭「鬧革命」，而應回本單位去搞「鬥、批、改」，毛並開始在很多場合頻頻談到紅衛兵要「大聯合」，就像一年前，他屢屢號召紅衛兵要起來造反一樣。
- 100 楊、余、傅垮臺之後，黃永勝、溫玉成接任總參謀長和衛戍司令，黃永勝手下四野系統的另一幹將閻仲川不久也調任副總參謀長，以廣州軍區將領為班底控制了三軍指揮權及衛戍北京的任務。
- 101 1967年時各地發生的武鬥，雖也有開始使用自動武器的，但一般來說，所用武器以木棍、長矛、石塊為主，而1968年的武鬥則開始普遍使用近代自動武器。1967年的武鬥，多為偶發的臨時衝突，如衝擊對方的集會，或阻擊對方的遊行隊伍等，雖也有因爭奪學校或機關建築物而演

成攻防戰，但規模小、時間短，死傷也少。1968年的武鬥，則多以攻佔整個城市或地區為目的，戰鬥演成長期化，出現專業的武鬥隊伍，雙方為爭奪一個據點，戰爭可以延長數周或數月之久。1967年的武鬥，目的在爭奪新的權利機構中的名額、地位，1968年的武鬥，則以擊潰、殲滅、征服對方為目的。1967年的武鬥，軍隊雖已介入，但介入的方式多止於政治表態，很少出動軍隊戰鬥，僅在江西撫州、四川重慶等少數地方參與戰鬥。1968年的武鬥，軍隊則幾乎普遍介入，並且在很多地區演成軍隊對軍隊的內戰。直至1968年7月，毛在京接見首都五大學生領袖，毛以國家領袖身份下了一道明確的指示：「誰如果還繼續違犯，打解放軍，破壞交通，殺人放火，就要犯罪，……就要實行殲滅。」毛真的厭惡了武鬥嗎？非也，毛是對自己一時無法有效對付林彪一夥的明爭暗抗感到惱怒和激憤，也就在這個講話中，毛突口而出：「大打，打他個十年、八年地球還是照樣轉動，天也不會塌下來。」見（美）羅斯·特里爾著《毛澤東傳》，第401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 102 是會，林藉口批楊、余、傅，對江青作了肉麻吹捧，稱「江青是我們黨內女同志中很傑出的同志，也是我們黨內幹部中間很傑出一個幹部，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熱烈的革命情感，同時又很有思想……」而林的妻子葉群便在一邊呼應般地振臂領呼：「江青同志是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整江青同志的黑材料罪責難逃！」「誓死保衛江青同志！」「反對對毛主席和江青同志迫害！」吳法憲也應聲帶頭高呼「誓死保衛江青同志！向江青同志學習！向江青同志致敬！」江青則回報以「誰反對毛主席、林副主席就打倒誰！」周恩來也跟著領頭高呼「誰反對中央文革就打倒誰！」謝富治則高呼：「誰反對江青同志就打倒誰！」姚文元也惟恐落趕緊振臂高呼「打倒兩面派！打倒資產階級野心家！」於是乎，會場上口號此起彼伏，喊成一片。
- 103 關於楊、余、傅落馬的經過，據林彪自己講話中透露：「中央在主席那裏接連開會，開了4次會，會議決定，撤銷楊成武的代總參謀長職務……」。（〈林彪3月24日接見軍隊幹部時的講話〉，見香港中文大學《文革史料光碟》。）毛為作此決定在邸中連開4次會，說明在解決問題時，毛、林較量的激烈。然而，對於軍隊如此重大的人事變更，當時的幾位軍委副主席卻都是「毫無所知」（聶榮臻語）。這次會議有誰參加了？林彪話中的所謂「中央」都有些誰？林彪沒有說，現在能見到的資料也沒有這方面的透露，顯見由於涉及毛、林之間的交易，參與此會的只會是核心層的少數幾個人。但有一點是清楚的，從以後的人事安排看來，四天會議中，林顯然向毛開出了很高的要價，毛也因此被迫讓出了空軍、海軍等重要兵種的指揮權。
- 104 不放出大誘餌，魚根本不會上鉤，毛下了大賭注，放出總參謀長和衛戍區司令的大誘餌，借此把林派大將黃永勝、溫玉成調離了他們多年經營的「四野基地」廣州軍區，就此絕了林彪的後路。